

XUE

学习
与
批判

3

1975

价: 0.20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目 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3)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 (16)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的报告》的一点体会……………方 海 (25)

伟大的道路 光辉的真理

——学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雍 昌 (28)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 (33)

- 读旧报有感 翟 青 (38)
- 有这样一张便条 章智明 (42)
- 在斗争中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
——上海沪东造船厂的调查 任 菁 (44)
- 小评论：三分钱盐还得好！ 树 清 (48)

文 学 评 论

- 他们在“交换”什么？
——读苏修中篇小说《交换》 杜华章 (50)
- 附：交换(苏修中篇小说·节译和摘要)
- 由“结合部”想到的
——看电影《渡江侦察记》的一点感想 上海味精厂工人 杜恂诚 (63)

经 济 问 题 研 究

- “两泵”对比以后.....
——上海水泵厂访问记 本刊记者 (65)
- 从找差距中明确了学大寨的方向
..... 上海市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党支部 (71)

教 育 革 命 经 验 总 结

- 中学开门办学的一个新经验
——南市区中学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的调查 何 欣 (73)

社 会 调 查

- 扫马路见闻
——在长治路清道班的半个月里..... 上海师范大学 阎水金 (77)
上海公交公司汽车一场 陆晓禾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论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的指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了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应当引起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供大家学习。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些语录，并且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著作。同时，要组织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学好。要充分理解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国亿万人民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抓紧抓好，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

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八五〇年一月——十一月一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一八七一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已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

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

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16—517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末情形也就只能这样。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也许这个时期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

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201页。

是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

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2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

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252页。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

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

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独身者用他每天八马克或十二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勉强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的货币职能了。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被公社用来支付生活资料，从而又成为目

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的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真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象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一八七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2—343页。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一八七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350页。

什么是周转自由呢？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周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都知道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我们在理论上很了解这一点，而在俄国，凡留心观察小农的生活和经营条件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6页。

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30卷第206页。

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一代资产者的根源。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九一八年四月），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非常熟悉经济情况的李可夫同志对我们说，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事实呢？你们只能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当做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

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年
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67页。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3页。

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逐渐与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

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我们也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七——八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

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

列宁：《伟大的创举》（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不仅把“共产主义”这个词用做党的名称，而且把它专门用来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是会更正确一些的。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43页。

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把我们已经开始的进行了两年的革命进行到底。（鼓掌）这个革命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只要我们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要我们在整个国家管理方面、整个国家建设方面、整个新生活的领导方面，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8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阅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以及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学校和党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会因为难懂而感到害怕，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后来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每个想认真思考和独立领会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不仅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你们也会每天在任何一份报纸上涉及任何一个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材料中碰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国家，国家的实质怎样，国家的意义怎样，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怎样。

列宁：《论国家》（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41—42页。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论林彪反党集团 的社会基础

姚文元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

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

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坚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 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

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

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

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好，“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侵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一点体会

方 海

一九四九年三月，正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还提醒全党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下，要特别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预防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情况发生。

建国以来，我们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牢记取毛主席的教导，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那么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朝气蓬勃地前进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但是，也有少数人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经不起资产阶级的捧场和糖衣炮弹的袭击。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发生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多种多样的。诸如：

不读书，不看报，不调查研究，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这是第一种。

革命意志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无病求医，小病大养，游山玩水。这是第二种。

害怕艰苦，贪图享受，到处伸手，搞特殊化。这是第三种。

以功臣自居，闹名誉地位，个人利益第一。这是第四种。

庸俗作风，低级趣味，拉拉扯扯，吹吹拍拍。这是第五种。

亲托亲，友托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顾党的原则，违反政策。这是第六种。

多吃多占，损公肥私，非法占取。这是第七种。

以协作为名，搞私人交易，从中渔利。这是第八种。

比“大方”，讲“排场”，铺张浪费，大吃大喝，慷国家之慨。这是第九种。

说假话，文过饰非，传播小道新闻，闹资产阶级派性。这是第十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具有这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崇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所以会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由于受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毒害。如果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很有可能堕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里，拟着重对几种糊涂思想作一些分析。

“革命有功，多享受一点也是应该的嘛！”这是资产阶级的雇佣观点。他们把自己当作商品，功劳看做资本，一本万利地觅取享受。这是列宁所严厉批评过的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其实，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计较个人功劳大小。在资本主义的黑暗年代里，马克思的一生是艰难困苦生活的一生，又是紧张工作、顽强战斗的一生。马克思说过：“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却往往两倍于此”。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啊！最后，马克思是坐在书桌前，在他的战斗岗位上与世长辞的。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里，把生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什么时候计较过功劳大小，什么时候又想到过要用革命来换取个人享受呢？想一想马克思

的教导和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能不觉得脸红吗？

“地位变了，生活上特殊一点，也是工作上的需要嘛！”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如果地位起了变化之后，就不愿再当普通劳动者，欣赏或迷恋资产阶级法权，借口情况特殊而处处搞特殊化，那就错了。这样的同志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而不是群众之外、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因此，共产党员、特别是当了干部的党员，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才是应有的态度。

“生活作风，小节问题，何必大惊小怪。”这话不对。毛主席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执行正确路线的重要保证。我们工人阶级一部分和党员一部分中出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往往都是被资产阶级从生活上打开缺口的。生活上不干净的人，在政治上最终也不可能是诚实的。从“三反”“五反”、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揭露的那些蜕化变质分子来看，无不都是这样。我们必须坚决肃清林彪一类骗子所鼓吹的“小节无害”论的流毒，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本色。

资产阶级腐蚀和无产阶级反腐蚀的斗争，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因此，我们的同志一定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出发，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敢于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作坚决的斗争。资产阶级的邪气不压下去，无产阶级的正气就不能抬头。事关大局，要出以公心，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广大群众是坚决要批判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而一些程度不等地沾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同志，也是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通过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来改正错误和缺点的。我们坚定地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斗争中进一步改造自己，荡涤自己身上从旧社会带来的污泥浊水，就一定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在这样的时刻，重温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特别感到亲切。“拒腐蚀，永不沾”。让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道路 光辉的真理

——学习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

雍 昌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写下许多光辉著作，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真学习这些著作，了解列宁是怎样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对于我们今天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夕写的《国家与革命》，是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光辉著作。在这部著作里，列宁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谬论，恢复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十月革命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革命危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尖锐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当时的俄国，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形势，举行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工兵苏维埃。但是，由于钻进工兵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背叛了革命，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手里。在这种形势下，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为摆在俄国工人阶级面前的迫切任务。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

可是恰恰在这样的时候，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把国家问题弄得极其混乱。他们迷信议会制度，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大力贩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张和资产阶级真诚合作。因此，批判修正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武装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领导他们夺取政权，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迫不及待的课题。列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了《国家与革命》，从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运用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

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论述了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行消亡的经济基础等问题。列宁指出：“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列宁还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有运用无产阶级专政，限制和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战胜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共产主义因素，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由于十月革命迅速爆发，使得列宁没有来得及写完《国家与革命》。列宁兴奋地说：“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列宁为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号召劳动群众剥夺剥夺者，废除土地私有制，在全俄国普遍建立工农政权。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一切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疯狂反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革命叛乱，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攻。党内一小撮机会主义者被残酷的阶级斗争吓破了胆，竟然同意成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要布尔什维克党人退出政治舞台。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也很激烈。苏维埃政权在接管银行、对工厂企业实行工人监督的过程中，遇到了资产阶级的拚死反抗。无产阶级由于刚取得政权不久，缺乏经济管理的经验，又缺少管理经济的机关和干部，因此在经济战线上出现了一些薄弱环节和混乱现象。资产阶级到处刮阴风：“布尔什维克执政已经两个月了，但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而是由混乱、内战和更大的破坏所造成的地狱”。党员、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在革命转折关头被这些现象所迷惑。这样，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十月革命，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当时的斗争焦点。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列宁在《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一文中，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不经过破坏旧的国家机器，“便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已经开始实行，而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是革命的新生事物。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使劳动者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神圣战争”。列宁认为，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反映了各个阶级不同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

列宁提出铲除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的新任务，是在深入考察了俄国的历史和现状的情况下得出的。列宁在1918年1月11日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说：“不言而喻，在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不可能是相同的”。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迟，农村人口众多，封建残余相当顽固，小生产者大量存在，“而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而俄国产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土壤要比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得广泛。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还存在着五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成分。当苏维埃政权正忙于同资产阶级反革命叛乱势力作斗争的时候，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趁机抬头。有些人用小私有者的眼光看待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城市和农村中千百万小业主和小商人从事投机活动，富裕农民利用国家和人民的暂时困难大发其财。在革命大转变的时候，有些社会渣滓也自然不能不“露头角”。社会上的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就进一步阐明了革命胜利后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铲除资本主义土壤，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要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的土壤，必须有严整的组织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把过去由剥削者压迫人民遵守纪律，转到人民自觉和自愿地遵守苏维埃社会主义性质的纪律；在农村中，依靠贫苦农民，争取中农，镇压富农的反抗，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用无产阶级专政管理好每个地方和单位。列宁总结历史经验说：“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号召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保持过去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把革命进行到底。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发表，立即得到了党和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护，成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新进攻的进军号。布尔什维克党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和其他革命团体的领导，把全部大工业和部分中型工业收归国有；农村中，工人帮助贫农成立了贫农委员会，镇压富农的反抗，在这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农业公社和其他生产联合组织。同时，苏维埃政权加紧内部整顿，要求党员、干部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允许搞任何特殊化。列宁自己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18年5月，人民委员会总务处长布鲁也维奇由于擅自给列宁增加工资，就遭到了列宁给他的严重警告的处分。由于各条战线都对资产阶级展开了进攻，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加强。

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吓坏了外国帝国主义。1918年夏季，英、美、法、日、德等帝国主义联合发动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国内的敌人也蠢蠢欲动，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拚命想恢复旧制度。残酷的战争，进一步锻炼了苏维埃的无产阶级专政，使它变得更加坚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怀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深厚感情，紧密地团结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周围。中农也经历了反革命势力造成的祸害，转到革命一边。根据战争需要和考虑到这些有利因素，苏维埃政权决定对全部工业实行国有，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迫使

资产阶级参加义务体力劳动，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毫无疑问，在一个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必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存在，还在不断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它不仅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产生出来，而且还从那些虽然摆脱了旧制度的桎梏，但仍处于小生产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产生出来。即使有些工人，他们在建设新社会，但还没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还有一些所谓“共产党人”，在人民赶走地主资本家后，他们来了，赶紧爬进一个安乐窝去捞一把。这些资本主义传统势力和由此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都严重地对抗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不进行斗争，苏维埃政权就休想前进一步。在苏维埃政权积极开展这种斗争时，资产阶级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咒骂苏维埃政府破坏了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一九一九年五月，列宁写了《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一文，痛斥了资产阶级的虚伪说教，指出所谓“自由、平等”历来就有其具体的阶级内容。“‘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因为“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所有制妨碍着人们享受这种平等。可以立刻废除富人的房屋所有制，可以比较快地剥夺资本和生产工具，但是货币所有制却要保留下来”。货币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它通过等价交换的形式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货币没消灭之前，没有真正平等。“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就必须破除资本主义的虚伪平等形式。列宁的这些论述在理论上驳倒了资产阶级，为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铺平了道路。

列宁在组织反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斗争的时候，不断地加深研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写了《伟大的创举》这篇光辉著作。在这篇著作中，列宁高度评价了莫斯科的铁路工人自动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基本理论和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列宁指出：“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者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后，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彻底改造小生产者，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把这种“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誉为“伟大的创举”。列宁说：“‘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为了发挥党组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列宁还提出要利用这个创举继续开展清党运动，以勇敢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地用革命精神投入革命实践作为党员重要的条件。把那些抗拒到前线去作战，而想钻进安乐窝享受的所谓“共产党员”清除出去。

在《伟大的创举》发表不久，列宁又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写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

和政治》，指出：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列宁还强调指出，农民象一般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为了消灭阶级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而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而困难的任务。

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共产主义因素战胜资本主义势力，单靠组织上的措施还不够，对于人民群众主要地还是要采取思想教育的方法。列宁非常重视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问题。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列宁指出：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就是为了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一切小私有制服务的道德”。这是因为在旧社会中，不是别人剥削你，就是你剥削别人。这种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而共产主义教育就是要和一切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使每一个工人和农民对自己都有这样的认识：我是自由劳动大军的一分子，不要资本家和地主，我自己就会建设自己的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的秩序。”列宁认为，要保证共产主义的胜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做得如何。

由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措施，使苏维埃人民自觉地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从而保证了反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列宁在领导着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同时，还非常注意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把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联系起来。列宁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总结了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列宁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在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敌人，是“左”倾思潮，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列宁在这部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领导作用，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去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列宁说：在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中，“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那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写出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指导我们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今天，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正阔步前进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道路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正激励着我们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通信

一、伍农给龚庆的信

小龚：

自从春节在上海聚首后，分别已将近十天了。我一回到生产队，就同贫下中农一起，投入了热气腾腾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一到晚上，我们生产队的政治夜校可热闹了。许多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聚在一堂，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今天，我跟一部分社员到生产队养猪场出粪，在休息的时候，很自然地谈到了怎样正确地对待按劳分配的问题。有位社员提出：“按劳分配，既然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为啥我们现在还要用它？既然要用它，为什么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当时，我们就请养猪场的贫农饲养员谈谈他对这个问题的体会。这位饲养员同志是一个象小说《艳阳天》里的贫农饲养员马老四那样的人物。他在养猪场里，猪越养越多，工作越来越忙，社员几次提出要给他加工分，他都坚决不要。每年遇上大忙季节，他总是挤出时间到大田参加义务劳动，从来不要队里记一个工分。老母猪落小猪后，他还从自己家里拿来小米，烧小米粥给老母猪吃。象这样一个热爱集体的老贫农，他对按劳分配是怎样看的呢？

这位老贫农先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队里抓阶级斗争不狠，一度刮起了资本主义歪风，影响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的干部就认为，社员积极性不高，是因为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不硬，不彻底。要“硬碰硬”，那年夏熟就样样农活都搞了定额。“割麦按垌头，挑粪数担头，拔秧算把头，插秧讲行头”。后果怎么样呢？很成问题。有一天割麦，按垌头记工，有的社员就抢割麦子长得挺刮的垌头，不肯割麦子倒伏的垌头，你争我吵，闹得不团结。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有的社员竟派小孩子抢在前面，守在麦子挺刮的垌头上，等大人出工。过去不搞定额，社员们谁完不成，就接垌头，大家一起相帮，发扬互助精神，说说笑笑，越干越有劲；现在是定额挂帅，“黄牛角，水牛角，各归各”，也不讲共产主义风格了。有的社员劳力强，一天的生活，四小时就做完了，回去种自留地；有的社员劳力弱，从早干到晚，还完不成任务，没有办法，只好把老人小孩全部拉出来干。搞了定额挂帅，有的社员为了抢工分，割麦丢三拉四的，质量也不顾了。有了这个教训，队里就对定额挂帅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大讲“各尽所能”，加强思想教育；评工分，既按社员的劳动来评，也评思想，评团结，评风格。越评，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高。这几年，小孩子也起变化了。他们

跑到田头，是为集体拾麦穗，不是帮家长抢垅头了。

我听了老贫农的这一番话，深感讲按劳分配，不能丢掉“各尽所能”，不能搞物质刺激。再说，就是按劳分配本身，体现的也是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是“按劳分配万岁”，也不能是“按劳分配万能”。按劳分配，我们在现阶段要承认它，允许它存在；但不等于去扩大它，发展它；相反，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加限制，很容易出修正主义。前几年，我们队里搞定额挂帅，弄得社员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抬头，社会主义思想少了，共产主义风格差了，这样搞下去，不出修正主义才怪呢！

我还有这样的感觉：在个别地方或单位中，往往有对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认识不足的情况。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群众积极性高了，有人就全部归功于按劳分配，群众积极性低了，这些人又不加分析地归罪于没有搞好按劳分配。于是，什么分成拆账，什么“小包工”，什么面盆奖、毛巾奖，统统都搞起来了。你记得小牛吗？他在林场伐木，过去曾经给我寄过一封信，要送给我面盆、毛巾，说他们那里尽是发这种奖，他自己领了许多用不了。不领吧，还要批评他缺乏路线觉悟。他很有意见。我支持他。这种动不动就依靠发奖的搞法，既腐蚀人的思想，又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浪费，发奖的人为什么不深入地想一想呢？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高涨，“各尽所能”地为国家和集体创造财富，难道不是党的教育，反而是物质刺激出来的吗？

最近，在勤奋农场的刘大个子，前天到县里参加学习班，路过我们这里住了一宿。我们谈到深夜，他对我们谈了他们农场的一些情况，我想在这里转告给你。刘大个子说：“我们农场有七百多人，上海去的知识青年五百多个。由于路线正确，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很高，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互助精神，根本不象有些地方那样，给多少钱，出多少力。我们想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有一次，邻近一个农场的青年和我们干同样的活，他们有二十个人，我们只有四个。他们实行的定额包工，稍为干了一阵，就坐下来休息了。我们四个人拚命地干，谁也不想休息。他们就笑我们：‘你们这样熬，有力气不会省省。’我们不管他们怎么说，还是继续干，一天不到，四个人干的活超过了他们二十个人的工作量。他们自觉脸上不光彩，说：‘不许你们再这样干了！’为什么相差这样大呢？不是这些青年不好，根本问题在于路线。这可真是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呀！”

刘大个子的这一席话，很能发人深思。当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那四个包括刘大个子在内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拚命干的知识青年，还有我们生产队那位一心为集体、不计劳动报酬的贫农饲养员，这些闪闪发光的人物形象，一下子都涌现到眼前来了。在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样的人物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呵！正是他们，最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也懂得什么叫按劳分配。那些热衷于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同志，在这些英雄人物面前，难道不觉得脸红吗？

信写得长了，夜也深了。就写到这里吧！等着你的来信。

致以

战斗的敬礼！

伍 农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二、龚庆给伍农的信

小伍：

巧得很！收到你的来信的时候，我们码头工人也在对按劳分配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有人说，按劳分配本身是好的，只是有人在贯彻执行的时候把它搞歪了。也有人说既然按劳分配是个“弊病”，干脆取消算了。到底怎样认识按劳分配？你来信中谈到贫下中农的体会，对我很有启发。我在这里也想谈谈我们码头上讨论的情况。

前两天，我们几个青年工人去访问了我们码头的退休工人黄师傅。黄师傅在我们码头上是很有名的。他出身很苦，解放后翻身感特别强烈，哪里工作需要，他就奔向那里，装卸工、辅助工样样都干，大家都叫他为“老黄牛”。他社会活动多，工作调动频繁，在一九六三年评级的时候，他刚当炊事员不久，领导上照顾他的情况，给他评了四级。但是，他带出来的青年，因为一直在技术岗位上工作，不少人被评为五级，有的甚至评为六级。这次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席话：

“我的工资已经不少了。几十块钱一个月的退休金，同老伴完全可以欢度幸福的晚年。子女都工作了，他们都可以自食其力。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码头工人怎么能过上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最近，我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总感到过去有些人对按劳分配的解释有问题。他们把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吹上了天，说什么劳什么，得什么，劳多少，得多少，这最公平合理。真的公平合理吗？我要问一句：第一、急党所急、服从调配的人，同那种满脑子私心杂念、不肯服从调配的人，我们要的是哪种人？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人有了文化，掌握了熟练技术，是谁培养他的？”

黄师傅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回到了码头，同广大码头工人一起讨论开了。大家再学习毛主席关于“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等指示，联系到我们码头上，有的人不肯当炊事员、辅助工，有的人不服从调动等情况，认识到这确实是同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分不开的，因为八级工资制把工种分了等级，在同一工种内又分了许多级别。有些人为了多拿钱，只肯干这种工，不愿干那种工，不肯服从调配，同这种资产阶级法权难道没有一点关

系吗？对于这种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分配制度，我们在目前虽然还得承认它，允许它存在，但对资产阶级法权必须逐步加以限制，决不容许去扩大和巩固它。

其实，把工种分成高低，把技术分成等级，这确实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学习和掌握技术，是要自己花本钱的，是属于私有的。反映到工资上，那就是“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反杜林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学习和掌握技术的费用是社会担负的，技术就不应该私有。恩格斯说：“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反杜林论》）那种区分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八级工资制，规定什么工种拿什么工资，哪一个级别拿哪一级工资，这不是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吗？！

一学一议，许多“老码头”的劲道来了。在他们的议论中，有一件事对我的教育特别深刻。一九六四年，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曾刮起一股要“彻底贯彻”按劳分配的歪风。我们有一个码头领导干部就曾经搞过试点，他规定码头的活能按件算的工种一律实行计件工资，实在无法计件的工种才实行计时工资。计时工资平均每小时三角二分，做一小时算一小时。计件工资做一件算一件，折合计时工资，大约每小时四角八分。装卸工计件，司机计时。结果怎样呢？有的说，现在工作时间是我自己的，我愿意多做一小时就多做一个小时，我不愿意干就不干，谁也管不着。有的说：稍为多做一些够了，再提高上去，以后要修改定额的。定额一修改，岂不是自讨苦吃。还有的人为了多挣几个钱，蛮拚蛮干，最后把身体也拚坏了。结果这个码头试点没有试完，就被工人一炮轰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码头上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滴，大干苦干，年年夺得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码头工人对这个问题反复议论的结果，最后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靠什么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是靠政治挂帅，还是靠八级工资制？社会主义积极性决不是靠金钱来调动。如果是钱多积极性就高，钱少积极性就低，那只能是资本主义积极性。我把你的来信在工人中宣读了，当读到小牛不要奖给他的面盆、毛巾而受到批评、说他路线觉悟不高的时候，大家哈哈大笑。“红小兵”（记得吗？他就是当年我们班上个子最小的红卫兵小高）说，照这个批评小牛的人看来，“赵公元帅”的路线觉悟要算是最高的了。可是，这条路线列宁早就批判过了。列宁说：“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在资本主义社会，“做多少事，给多少钱”，或者“给多少钱，做多少事”，这已成了天经地义的了。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共产党宣言》）

我们码头工人在学习讨论中，懂得了现在我们国家还存在两种公有制，还有商品制度，个人消费品还得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对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

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加以限制。怎样限制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这个问题在思想上搞清楚,特别是要强调“各尽所能”,要提倡自愿的、无定额的、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早在一九一八年初,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就提出要同用旧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的“旧习惯”作斗争。一九一九年,列宁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倡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把它称为“伟大的创举”,并说:“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毛主席也一贯教导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学习张思德同志那种完全、彻底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精神。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这样伟大的意义,是因为它标志着千百万群众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打破了资产阶级的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

我们码头上,有位严于解剖自己的老干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对刘少奇搞的那套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贯彻执行得很起劲。他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段指示的时候,由于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体会比较深刻。这位老干部说:当时他并没有感到刘少奇所鼓吹的物质刺激有什么不对,因为工资有相对稳定性,不可能每月调整。在调整工资以前,又怎么去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呢?这样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奖金。奖金可以根据每人每月每天的劳动表现,随时变动,能够充分调动积极性。但事实呢,恰正相反。实行奖金以后,结果是“月评月奖”变成了“越评越僵”。他当时由于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不仅没有转过来,反而进一步推行了管、卡、压这一套,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现在,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认识到过去这一套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变种。他说:“我正是没有把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大问题搞清楚,结果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走上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邪路。这是多么危险呀!幸亏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我从修正主义的边缘上拉了回来。现在我体会到,如果我们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资产阶级专政,如果林彪一类上台,还是会跟着走的。”我看,这位老干部的谈话,倒确实是一番经验之谈哩!

好吧,今天就写到这里。哟!我又想起一个问题,在讨论中有人要我谈谈马克思讲的在按劳分配中通行的还是那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这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我说不大清楚。我想,战斗在商业战线上的小桑,她在学政治经济学,一定可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吧!我准备写信问问他。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体会,也盼来信。

紧紧地握手!

龚庆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读旧报有感

翟 青

这里抄录了两则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新闻报道，当时都公开地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现一件严重的贪污腐化案件。该台工务室主任兼广播器材科科长路星元，今年三十一岁，山东临沂人，学生出身，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伍，同年八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进入大城市后，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奢侈生活的影响，滋长了个人主义的享乐思想，终于发展到蜕化变质，而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在任职九个月间，利用自己职务，先后贪污人民财产共达二亿四千七百余万元（注：相当于现人民币二万四千七百多元）之巨。生活日益腐化，竟至以三千万元（注：相当于现人民币三千元）巨款，分租房屋，先后与两个不正当女人姘居。

——《解放日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上海市民政局等单位党内外同志，揭发曹××蜕化变质的可耻行为。

曹××（注：当时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以来，依然保持与发展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并感染了浓厚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思想。因而在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违犯党的政策，闹宗派，以极恶劣的家长式作风对待工作。……在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支配下，他的生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例如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通常说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他个人仍独自保有马一匹、汽车两辆，十里、八里路也要坐汽车。一九四七年“三查三整”的整风运动中，胶东行署揭发出的材料证明曹××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用，就得由二三百个中农来负担。他为了冬天要吃菠菜，逼着群众扫雪为他挖菠菜；要吃鸡，就逼着群众把正下蛋的鸡卖给他杀了吃；要吃鱼买不到时，就逼着警卫员下河去捉。他这类不能容忍的错误，在一九四七年的整风运动中曾被一一揭发，并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领导上给予他撤销行署主任职务的处分。几年来，

党曾一再对他进行教育，加以挽救，但他对于自己的错误仍阳奉阴违，以至来上海后更变本加厉，完全蜕化变质。

他在生活上一贯滥用职权，目无制度，穷奢极欲，登峰造极。他住着原来战犯汤恩伯的“公馆”，犹嫌不足，竟花了巨量汽油洗掉原有油漆，并另花二千五百万元（注：相当于现人民币二千五百元）重加粉饰，大事修理；为了使房子“美化”，窗帏全部用粉红色泡泡纱另制。公家原拨给他一辆很好的汽车，他还不满足，为了充排场，图享受，又用公家一部吉普车换了一辆有暖气、冷气和收音机设备的汽车。为了买一把剪刀，他亲自带着采购员坐汽车跑遍四大公司。他宴客时，总务科怕挨他的骂，往往四处奔跑采购，……他吃饭顿顿要自己点菜，民政局群众说：“曹局长的生活比地主、资产阶级还好。”他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追求享乐腐化的生活而恬不知耻。

——《解放日报》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

这两则报道，在当时都是震惊全市的头版新闻。其实，从“三反”“五反”运动揭发的材料看，类似路星元、曹××这样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腐蚀的状况。二十多年前的新闻，在今天固然早已成了旧闻，但它作为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材，是不应当被人们遗忘的。

路星元、曹××这类事件的出现，不是一两桩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随着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如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预见的那样：“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建国以后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为了反抗社会主义改造，从经济到政治向无产阶级展开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猖狂进攻。他们在经济上用种种非法手段把大量的国家财富盗为私有，任意挥霍；在政治上对一些党员和干部进行腐蚀收买，让这些挂着共产党员招牌、披着国家干部服装的资产阶级“坐探”、“奸细”出面来危害社会主义事业。路星元、曹××一类人，就是资产阶级腐蚀的产物。

为了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毛主席庄严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首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在人民政府内部、在人民解放军以及人民团体内部，展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其后又在工商业界中展开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场斗争，清算了危害社会主义的“三害”“五毒”行为，有力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为什么一些革命多年、入党多年的干部和党员被资产阶级甜滋滋的嘴巴吃掉了呢？为

什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醒全党同志应当预防“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事情发生了呢？还是让历史事实来回答吧。据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解放日报》的记载：“路星元早已结婚。其妻现为山东家乡妇女识字班教师，已育子女二人。但自去年九月和奸商李德维（上海电通拍卖行经理，曾当过伪上海警察局包打听）接近后，李为了想利用路星元关系，从国家财产中窃取非法利益，即千方百计勾引路星元，除阿谀逢迎、馈赠礼物（如大衣毛衣等）外，并经常带路出入舞厅，邀路赴宴，并由私娼、舞女等作陪，至此，路星元完全坠入腐化堕落的泥坑中。”资产阶级为了改造路星元，宴请，捧场，行贿，“美人计”，哪一样没有用上呢？都用上了。再看一看该报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刊登的路星元本人的供词吧：“自和李德维（奸商）接近后，他经常带我去这种酒肉花绿的地方，象国际饭店、跳舞厅、交际花家中，揭开了腐化社会的窗帘。我了解了：上海除了终日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忙忙碌碌，为生活而奔跑的以外，尚有另外的一套，那就是这种酒肉世界。经过他们请客吃饭，了解了花天酒地的一面后，使自己对革命工作不感兴趣，羡慕商人的自由散漫生活，这时立场上起了质的变化。”把上面两段材料合起来看，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资产阶级腐蚀和革命意志薄弱者被腐蚀的过程啊！路星元这类人，平时既不认真学习，又不重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一进了城，什么宴请啊，礼物啊，捧场啊，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花花世界，不由得目眩神迷，魂飞魄荡，很快就堕落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当年上海大康药房的老板王康年曾大言不惭地声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这种充分表现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面貌改造无产阶级的狂妄语言，参加过“三反”“五反”运动的同志至今可还记得？没有参加过“三反”“五反”运动的青年同志又可曾听说过？须知资产阶级手上虽然没有真枪实弹，却有着糖衣裹着的炮弹，这种糖弹可比真枪实弹更厉害得多哩！

在贪图享乐这一点上，曹××同路星元并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在曹××的身上更多了一股当官做老爷、搞特权、摆架子的臭气。他有二十年的党龄，这也成了他骄傲的资本。他一贯自封“功臣”，向党闹独立，根本不把党的纪律和党的政策放在眼里。他把自己管辖的那个部门，搞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他经常对民政局的同志们说：“在民政局我不允许有相反的意见”。多么十足的霸气啊！他对警卫员、炊事员，象封建领主对待家奴一样；对干部则是拉拢那些逢迎拍马的人，打击那些坚持正确原则的人。至于坐特种车、吃特种菜、住特种房子，在曹××看来更是理所当然的了。这种人，把革命的经历当作交换享受的“商品”，表现得特别贪婪，而且这种贪婪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他们信奉的是列宁批判过的那种逻辑：“只要我能多捞一把，哪管他寸草不生。”联系到曹××在历史上犯有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严重错误，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看清楚他的为人了。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那样：“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

他们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这种头脑里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而又不肯改造的人,一遇到适当的气候,就会恶性膨胀和发作起来。曹××在当时被开除了党籍。象他那样的人,只能有两种前途:一是汲取教训,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一是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直到彻底垮台为止。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包含了对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深刻总结。为什么在工人阶级一部分和党员一部分中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呢?为什么在无产阶级和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呢?这是因为:“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我们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着社会主义,那个旧基地不是一下子就打扫得那么干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在各方面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即使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以后,也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今天依然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三反”“五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事实,一开始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资产阶级进攻的重要手段就是搞和平演变。他们妄图巩固和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用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腐蚀我们的某些党员和干部,从革命队伍中分化出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这种情况,建国二十多年来屡有发生。从“三反”“五反”到一九六四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揭露了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这是很值得深思和引以为戒的。

建国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不断强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当前,全国人民正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我们要注意联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要注意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自觉地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为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坚韧不拔地奋斗吧!

有这样一张便条

章 智 明

在《列宁全集》里，有这样一张便条：

“人民委员会总务处处长弗拉基米尔·德米特利也维奇·邦契——布鲁也维奇：

鉴于您不执行我的坚决要求，即向我说明为什么从1918年3月1日起把我的薪金由每月500卢布提高到800卢布，鉴于您擅自根据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哥尔布诺夫的同意就提高我的薪金的公然违法行为，直接破坏人民委员会1917年11月23日的法令，我宣布给您以严重警告的处分。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杨诺夫(列宁)”

读着这张便条，不禁深深地为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列宁，他是地球上第一个红色政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日日夜夜为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事业而辛勤操劳。可他的薪金却只同当时技术工人的工资相仿，吃的也同普通工人、农民一样，是黑面包干，甚至连牛油都用不上。布鲁也维奇身为总务处处长，怎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领袖当革命胜利后还过着如此艰难困苦的生活？他为了列宁的身体健康，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违反了人民委员会规定人民委员每月薪金最高标准为五百卢布的决定，擅自把列宁的薪金提高了三百卢布，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列宁想的和布鲁也维奇不一样。他想到的是如何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腐朽习气，向全党提倡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几千年来，官吏历来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这些人的绝妙写照。薪金高一点又算得了什么！但是，十月革命改变了旧时代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使这被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了过来。在列宁看来，无论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还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只有革命分工的不同，并无身份上的差别。地位高了，官做大了，只意味着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必须为党和国家更多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而并不意味着可以背离人民委员会的规定去搞什么特权。这就是列宁决定要处分对党忠心耿耿的布鲁也维奇同志的原因。

当然，社会主义的政策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当苏维埃政权刚刚呱呱坠地时，列宁由于考虑到当时经济落后、生产破坏以及种种历史条件，提出了付给资产阶级专家高薪的赎买政策，把他们的薪金提高到每月一千二百卢布，以后又提高为每月三千卢布。但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这是一种妥协，是一种临时性措施，“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而且，这种“高额薪金的

腐化作用”会“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影响到工人群众”。列宁谆谆告诫苏维埃政权必须对“高薪金”等一类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并且以身作则地为大家作出了表率。请看，克鲁普斯卡娅是这样叙述的：“当有人想给伊里奇置办一些华丽的摆设，给他支大量的薪金等等的时候，他是非常生气的。我记得，他为了当时的克里姆林宫警卫队长马立柯夫同志给他送来一桶什么花生酥，曾经怎样大发脾气”。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用这种精神来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当然决不允许布鲁也维奇同志擅自为他提高三百卢布薪金。

在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内部，与列宁这种崇高精神相对立的，是被列宁严厉痛斥过的那种认为“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的人。这些人把参加革命看作是“投资”或“入股”。现在革命胜利了，他该凭着这笔资本一本万利地坐享“红利”了。他们脑中所想的，正如鲁迅所形容的那样：“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出牛油面包来献他”。对于这种革命的投机分子，列宁在当时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把旧官僚赶走了，但是他们又来了，他们自称是‘共产党人’，如果不能称为共产党人，则戴上红领章，爬到一个安乐窝里去。怎么办呢？要再三同这种坏家伙作斗争，如果这种坏家伙钻了进来，就要清除他们，赶走他们，通过党员工人和经过长期了解的农民来进行监督”。（《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页）

但遗憾的是，苏联从列宁逝世以后，逐步放弃了巴黎公社的工资原则。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的时期，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方向，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但在工资分配方面，由于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和缺乏经验，强调技术而忽视政治，强调专家而忽视群众，强调物质鼓励而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而不反对高低悬殊，结果把按劳分配绝对化、凝固化，不断扩大了党政负责人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个人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如《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到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全面地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工资分配方面，他用“物质刺激”来偷换“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扶植那些盘踞各级领导岗位的蜕化变质分子，形成苏联社会上的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个严重的教训。

列宁写给布鲁也维奇的这张便条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了，列宁的故乡在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把持下也早已变了颜色，但它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却还是那样的深刻。在今天的苏联社会中，那些修正主义的精神贵族和官僚们，早已把列宁的遗训完全丢到脑后去了。他们开的是另外一些便条，托人情，下指令，千方百计地为个人牟取私利，为搞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同样是一张便条，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它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清楚地看到了今天的苏修社会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和平演变过去的。

读一读列宁的这张便条吧！它对我们学习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将有很大的帮助。

在斗争中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

——上海沪东造船厂的调查

在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中,要不要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包括注意对这支队伍的自身改造?上海沪东造船厂近年来的实践,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沪东造船厂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解放前的留用人员不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厂里的阶级队伍比较纯洁。这种情况曾经使厂党委的有些同志一度产生了太平观念,认为可以集中精力抓生产了。但事实恰正相反,就象有的同志事后回顾的那样:“那一阵子,资产阶级是打上门来了。”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短短几年功夫,厂里一部分工人和干部中间,相继出现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现象。人数虽少,却也够触目惊心。甚至一些比较先进的班组和个人,由于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也同样地出现了曲折和反复。斗争就是这么尖锐,无产阶级不抓紧自己队伍的建设,资产阶级就会乘虚而入。拿这个厂的柴油机车间起重工段来看,这个工段共有七十多名工人,专为全车间各个工段吊装大件,在生产上担负着“开路先锋”的重要角色。有一段时间,由于有些领导对他们偏重于抓生产,放松了思想工作,工段里不仅劳动纪律松弛,而且出现了小偷小摸乃至赌博的现象,结果大小事故不断。后来车间党总支用全力抓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无产阶级正气一抬头,工人群众树立起了为革命做工的主人翁思想,面貌就完全起了变化。在造船工业大干快上的一九七四年,这个工段基本上消灭了生产事故,有力地保证了全车间的生产顺利进行。

事实打破了人们头脑里的太平观念。厂党委通过研究工人队伍中出现的这种状况,认识到把工人队伍看作铁板一块,不承认分化,不承认斗争,这是违反“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社会主义企业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工人队伍也不是生活于真空之中。只要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和产生资产阶级的条件,资产阶级的阴风就必定要向我们队伍袭来。社会主义企业要依靠广大工人来办,企业领导者要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但如果不同资产阶级向工人队伍进攻的这股阴风作斗争,要带领这支队伍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社会主义企业的基层党组织,必须极端重视用共产主义思想加强对工人队伍的教育和改造,在斗争中锻炼出一支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宏大部队。

工人队伍中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的年龄、出身、经历各不相同,长处和短处也不

一样。资产阶级对工人队伍的腐蚀，往往是从工人身上的短处打开缺口的。沪东造船厂党委在抓工人队伍的建设中，注意做到使他们相互取长补短，以便增强他们抵制资产阶级腐蚀的能力。

老年工人和中年工人是沪东造船厂的骨干力量。他们都经历过旧社会的磨炼和熬煎，“新旧社会两重天”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就象船体车间有个老工人唱的：“提起旧社会，睡的茅竹棚，吃的薄粥汤，日子比黄连还难尝。看看新社会，住的新工房，生活安定有保障，幸福全靠共产党。”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些同志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较长，所谓“多干活，少出头，讲实惠”的思想在他们一部分人中间颇有点市场；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段时间里，程度不等地受到过“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这些东西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但并不等于全部解决了，一遇到适当机会，往往又会出现反复。厂党委通过抓典型的方法，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工人队伍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结合起来，使这支队伍能够担当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担。一九七三年，这个厂有位著名的“三老”（老工人、老党员、老先进）人物，由于长期放松了对他的思想教育，结果竟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走上了盗窃公物的犯罪道路。厂党委当即抓住这桩触目惊心的事实，发动全厂干部和群众来讨论，使大家认识到：老工人身上有长处，也有短处，如果不抓紧思想建设和自身改造，照样会“好了伤疤忘掉痛”，背离社会主义。只有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改造世界观，才能真正做到自觉地一辈子干社会主义。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工厂企业新进了一大批青年工人。沪东造船厂现有的青年工人，就占了全厂职工总数一半以上。他们大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对坏人坏事敢斗敢冲，对生产难关敢上敢拚，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支生力军。但他们的身上也有短处，这就是缺乏新旧社会对比的认识，缺少阶级斗争经验，比起老工人来，更容易受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厂里就有这样一个青年工人，出身好，表现也不错，就是从欣羨一双新式皮鞋开始，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渣滓乘虚而入，“慷慨”相助，最后终于跟流氓阿飞搞到一块，在短短的一年内，堕落成为一个犯罪分子。诸如此类的情况，使厂党委认识到，在抓工人队伍的建设中必须着重抓好青年工人的思想教育。近年来，他们除了引导青年投入阶级斗争、接受现实教育外，在厂党委领导下，共青团和工会组织还向全厂青年反复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回忆对比教育，引导青年研究阶级和个人的关系，研究解放后资产阶级腐蚀和无产阶级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批判“年纪轻轻，趁早白相”之类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使青年学会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蚀，树立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人生观。船体车间电焊工段六名女青年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她们是在一九七二年进厂的，刚进厂时看到高大的厂房、雄伟的船台，心中很是得意。但一知道被分配到工作比较艰苦的电焊工段，心中就顿时发凉，说什么“造船厂的大门走对了，小门走错了”。人虽在电焊工段留下来了，但脑子里却老在想着什么“幸福的车工，没出息的电焊工”，干活不起劲，学习不吭声。车间党总支及时分析了这种情况，就有的放矢地做她们的思想工作，引导她们批判资

产阶级，用无产阶级观点弄清艰苦与安逸、高尚与低贱的关系。思想上分清了是非，她们就再也不抱怨电焊工作“低贱”“艰苦”了，而是坚决表示：“一杆焊枪握到底，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火红的年代”。一九七四年八月，为了奋战“徐州”号万吨轮，她们和另外五名电焊青年女工组成了“猛虎班”，把铺盖搬进厂里，白天在船台大干，晚上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一支突击队。厂党委抓住这个典型，向全厂推广她们的经验。顿时，一个“大学马克思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在全厂青年中形成了，青年突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全厂各个岗位上。

在抓紧青年工人自身改造的过程中，厂党委特别注意引导青年工人正确处理师徒关系。这是他们在分析了轮机车间一名女艺徒走下坡路的教训中加深认识的。这个女青年刚进厂时，政治上要求上进，生产也很积极，大家称她是“重活脏活抢在先，哪里困难那里干”的小老虎。但由于她片面地把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理解为“听师傅的话”，对师傅宣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久而久之，最后在生活上犯了错误。其实，师徒关系也是一种阶级关系。师傅有一个按照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培养下一代的问题，青年艺徒也有一个怎样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问题。那种把师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的做法，是封建行会的师徒关系的余毒，不利于青年一代的成长。厂党委针对这种情况，在中老年工人中进行了“怎样为无产阶级带好下一代”的教育，在青年工人中开展了一场“怎样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讨论。大家开始认识到：带徒弟首先是要把无产阶级的思想、品质传给下一代；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则应当是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再教育。电器车间有个青年艺徒，在学习后提高了认识，贴大字报揭露自己师傅散布的错误言论。当遭到报复时，他不仅顶住了，而且继续揭发、斗争。厂党委及时支持了这位青年艺徒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批判了这个师傅的错误言行，帮助许多工人进一步认清了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和抵制工人队伍中一部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关系，全厂出现了师徒之间互帮互学，共同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朝气蓬勃的局面。为了更好地在斗争中加强工人队伍的建设，厂党委还注意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人群众。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厂党委抓了工人理论队伍的建设工作，并努力帮助这支理论队伍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成长，提高识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能力。近年来，铸钢车间曾经三次出现“包产到人”、“物质刺激”等资本主义倾向。但每当这种倾向一露头，车间工人理论小组就和广大工人一起写大批判文章和小评论，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说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批判“包产到人”、“物质刺激”的危害性，煞住了歪风，教育了群众，推动了车间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沪东造船厂的实践还表明：要抓好工人队伍的思想建设，前提是抓好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在这个厂，工人队伍中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干部队伍中也有。并且，工人队伍中一部分人的资本主义倾向，往往同干部队伍中的一些人牵连在一起。如实行“包产到人”和“物质刺激”，没有少数干部的支持，是搞不起来的。个别车间、部门在一段时期内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抬头，也往往同干部中的一些人有关。

近年来，沪东造船厂党委在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的基础上，把整顿领导班子、教育干部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起初，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现在的领导班子中，老干部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新干部根红苗壮,用不着这样花大力气抓了。对此,厂党委组织一部分干部和老工人回忆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使大家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腐蚀和侵袭是不可忽视的。当时,解放才刚一、二年,资产阶级就用糖衣炮弹把一批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干部拉下了水。这种资产阶级的腐蚀和无产阶级的反腐蚀的斗争,在今天仍然存在。事实也正是如此。厂里有一个工人出身的新干部,担任部门的领导工作后,不到三年,就利用职权非法购买国家计划内的物资,替自己盖房屋,在厂内外造成很坏影响。许多群众看到这个新干部这样做,痛心地说:“房屋盖了,干部垮了。”通过对这件事的解剖,使广大干部受到很大教育。大家分析了目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人搞特殊化,向党要名要利,说什么“我早就该入党”啦,“我应该担任某某职务”啦,以及发生某些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情况,进一步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干部队伍随着斗争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看到这一点,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只有在干部队伍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拒腐蚀,永不沾,才能使各级领导班子真正建设成为带领群众前进的战斗堡垒。

批评、处理有些犯了错误的干部,往往会牵涉到很多关系。怎么办?究竟是坚持原则,还是照顾关系,这对领导者是个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当党组织对某些犯错误的干部进行挽救帮助时,往往会有些人出来替他们抱不平。还有人有这样的顾虑:新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新生事物,处理不好会被说成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怎样对待这种舆论?怎样正确看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厂党委从党的利益出发,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发动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述,讨论怎样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的问题,帮助大家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原则,和一切危害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正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如果对一部分干部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闻不问,或者姑息放纵,那实际上是在纵容资本主义,只会使这些干部在错误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才是对党的事业的犯罪。在厂党委支持下,不少车间党组织发动群众,对犯错误干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这样一抓,有力地推动了全厂的干部思想工作。同时,厂党委在对干部队伍进行整顿和教育的过程中,既注意坚持无产阶级原则,又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们坚持这样做,就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紧密地团结了起来,使老干部受到教育,焕发青春,振奋革命精神;新干部抓紧学习,加强自我改造,更健康地成长。

沪东造船厂抓了工人队伍的建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落实到了基层单位。在这个厂,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市场越来越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得到发挥,全厂出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在当前的的大好形势下,这个厂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豪迈地说:“万吨轮,我们要一条一条造出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我们也要一个一个落实下来!”

(任 菁)

三分钱盐还得好!

树 清

黄浦区第一饮食公司中南合作食堂流传着一个三分钱盐的故事：有一次，店里有个青年上早班时喉咙痛，想喝杯盐开水，有人说：“店里有的是盐，喝一杯没关系。”旁边另一位青年听见了说：“店里的盐是很多，但它是集体的财产，现在喝一杯，等卖盐的店门一开，应该买了就来还。”那个青年等盐店的门一开，果然立即买了三分钱盐送回了食堂。

这三分钱盐还得好！好就好在它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店里的盐很多，喝一杯没关系”，这是公私不分的资产阶级私有观念在作怪。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可是由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资产阶级、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因此，刘少奇宣扬的“公私溶化论”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还在继续毒害着人们。还掉三分钱盐虽是件小事，但它表明了人民的财产、集体的财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怕是侵占一分一厘、一丝一毫也不行。那个青年还掉的不仅仅是三分钱盐，而是在向私有观念开火，向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开火。在这桩不显眼的行动中，闪烁着的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

三分钱盐还得好，好就好在它打败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侵染和腐蚀。毛主席曾经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无产阶级的包围、侵染和腐蚀，集中到一点就是用“私”字来向无产阶级进攻。无产阶级的反腐蚀斗争，实质上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私”字作斗争。三分钱的盐是“一眼眼”，可是在这“一眼眼”上就有一场公与私的斗争，就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反腐蚀就要从“一眼眼”抓起。记得南京路上的好八连战士在捡到一分钱交公时说过：“一分钱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不是你的，你却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就会在你身上留下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同样，如果吃了集体的一杯盐开水不还，也就是在资产阶级的糖弹面前打败仗的开始，就会在自己身上留下永远也抹不掉的污点。三分钱盐的故事体现了中南合作食堂的青年们在反腐蚀斗争中，防微杜渐，在“一眼眼”上“寸步不让”。有了这种“寸步不让”的反腐蚀斗争精神，资产阶级的任何糖衣

炮弹就都打不败我们，而我们却能打败任何资产阶级的包围、侵染和腐蚀！

三分钱盐还得好，好就好在它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继承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经在“锦州的苹果”的语录中高度赞扬了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毛主席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中南合作食堂的青年也自觉地认为，不吃食堂的盐是很高尚的，而吃了食堂的盐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盐。从锦州的苹果到中南合作食堂三分钱的盐，其间有整整二十多年了。但是，从中南合作食堂的青年们身上，可以看到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后，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不仅在青年一代中被继承下来了，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曾经把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看来他们的希望是注定要落空的了。中南合作食堂三分钱盐的故事就宣告了这些预言的破产。中国的青年一代必将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上接62页）

过了两天，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给正在上班的杰米德里耶夫打电话说，她同意搬到一起，只是要求快一点。于是这件拖了很久的事就开始进行起来。最后，终于在四月中旬和一个自行车运动健将换好了房子。当时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病情并不怎么坏。迁入新居那天还庆祝了一下，亲戚们都来了，只有洛拉和费里克斯没有回来，他们还在古涅，在大热天以前，他们通常是不回来的。房子换好了，但还有很多手续没有办完：两本房票簿都要换上杰米德里耶夫的名字。这件事并不比换房子容易。开始是区执行委员会不同意，因为申请报告写得不好，同时也缺少一些证件。掇客斯皮利顿·萨莫伊洛维奇这个老头子总是自吹，说什么区房管局的法学家是他的老相识，原来这都是撒谎。其实，他们迎面碰见的时候，甚至连招呼都不打。而法学家又是这件事情的关键人物，因为申请人不必出席会议，决定只是根据法学家的结论和交上去的证件作出的。七月底，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病情严重地恶化了，她被送进了一年她住过的医院。莲娜第二次提出了申请。这一次，法学家的态度很好，证件也都备齐了：（一）杰米德里耶夫是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儿子的证明；（二）租赁权票据的副本；（三）户口登记簿的摘录；（四）房管处发的付房租的房票簿副本；（五）公用房屋管理委员会记录的摘录，内容是请求执行委员会同意把房票簿合并。这一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死后，杰米德里耶夫患了高血压症，在家里卧床休息了三个星期。他好象一下子老了许多，精神萎靡不振。虽然还不是老头儿，但已经是两颊松垂的上了年纪的人了。

他们在“交换”什么？

——读苏修中篇小说《交换》

杜 华 章

杰米德里耶夫的妻子莲娜，同婆婆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是如此势不两立，以至她向丈夫宣称：“永远也不会和你母亲住在一起”。可是，当婆婆生了不治之症的时候，莲娜眼看婆婆不久于人世了，马上抛弃了她的誓言，决定立即和婆婆住到一块去，并准备立即把自己的一间住房和婆婆住的一间二十平方米的住房去同别人交换成两间一套的住房。她这样做的理由很堂皇：要照顾病人哪！不过，真正的原因虽然说不出口，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婆婆一死，她就可以把自己的住房由一间扩大为一个套间了。

一场从房屋开始的“交换”的丑剧就这样地开场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是莲娜和她的父亲。

在杰米德里耶夫看来，莲娜是一个“挺好的女人”。他的人生哲学是：“在世界上，除了生活和死亡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一切受前者支配的，都是幸福的”，“而一切属于后者的则是幸福的毁灭”。“生活”对于杰米德里耶夫来说，当然不是指任何别的人的生活，而只是指他自己加上他那个小家庭的“生活”。为了他的这种“生活”和“幸福”，那就得让别人毁灭，即使是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对于这种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哲学，莲娜是最理想的实行者。她属于那种“会过日子的人”，极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小家庭营造“安乐窝”。她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特点”——“不达目的不罢休”，就象一条猎犬，嗅觉灵敏，时时搜索着可以猎取的目标，一经发现，就立即扑上去咬住不放。她总是成功的，因为到处有人为她开绿灯。她看中了“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的工作，不管它“象珠穆朗玛峰一样，耸入云霄，高不可攀”，她一钻营，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研究所“变成一块炸透的鸡翅膀”那样地“被她放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着”，“在这里工作，又方便，又是按件取酬，地点又好”，“午休时可以跑到商店里，看看摆出什么新式样的女短上衣没有”。“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有一个地位高、待遇好的职位，这本来是杰米德里耶夫的远亲好不容易才打听到的，并且托杰米德里耶夫求他的岳父去帮助说人情。可这是个诱人的职位哪，那就抢吧。从别人手里抢夺职位，虽然不光彩，可这样的事难道只有莲娜才干吗？

这类包着脏东西的胶丸，“大家都在吞服着”。再说，她的丈夫杰米德里耶夫原来在煤气厂实验室工作，每月只能拿到一百三十卢布，每天上下班路上得花三个小时。既然碰上了这样的好机会，那又为什么不应当去抢来呢？女儿要进“乌丁胡同英语专门学校”，这所学校提供了进入外交部门的道路，充满了出国、接受赠品以及享受到外贸商店购物等特权的种种机会，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莲娜岂能放过！而且除了她的子女，又该让谁进这种学校去呢？够了，够了。这个“猎犬式的女人”具有一副“对生活有决定影响的性格”，这种性格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占有。凡是一切能够占有的东西都据为己有，凡是一切能捞到好处的地方都伸过手去，从金钱、地位、房子直到婆婆的碗橱中较好的碗碟。

这种资产阶级的强烈的占有欲支配着莲娜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她骂别人是“投机家”、“门槛精”。其实，她之善于投机和“门槛”之精，是谁也比不过的。她头子活，门路广，上上下下到处兜得转，吃得开。就说交朋友吧，可不是为了什么友谊，而是为了拉关系，将来可以“用得着”。她总能结识一些用得着的人，诸如民警局长啦，码头看守啦，疗养院的院长啦，等等，一有什么事，“开后门”可方便了。例如要买收音机，她只要先付给商店售货员五十卢布就行了。她又有“惊人的观察力”，善于鉴貌辨色，捉摸别人的心理，利用别人的弱点。她还有一项本领：撒谎。为了达到她所追求的目标，什么样的鬼话都能编造出来，说得头头是道，象煞有介事。她把“一切可恨的东西”都归结为“伪善”，其实伪善就象她的影子一样同她自己连在一起。

对这样的一个人，人们是决不会感到陌生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习性，自私、贪婪、冷酷、虚伪、诡计多端，在她身上应有尽有。这些新资产者同老资产者一样，把一切的一切，包括家庭关系、夫妻关系，都浸入了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说他们是“新”资产者，是因为他们是在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新冒出来的，而且仍然披着国家干部、技术人员、“出色的翻译”以至于工人等等的外衣。他们为了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而表现得特别贪婪和疯狂。我们在莲娜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疯狂劲儿。

对于莲娜的所作所为，他的丈夫杰米德里耶夫总是归结为“缺乏感情”、“不知分寸、不懂人情”。其实，莲娜的感情强烈得很。你看当邻居杜霞侵犯到她的利益的时候，她“多么厉害地把她痛骂了一顿”！骂得杜霞飞快地溜走，“就象被风刮走了一样”。她为自己的卑鄙行为辩护时，又是多么振振有辞：“莫非你们要我们过那一百三十卢布的日子，还叫维加在路上花三个小时吗？”在莲娜的眼睛里头，一百三十卢布，太少了！要把它无限地扩大才行！这不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情”和“分寸”吗？杰米德里耶夫似乎还不懂得：莲娜的存在，不是作为单个的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阶级。而他自己，也早已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成为其中的一员了，虽然有时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竭力要把自己装扮得“高尚”一点，不象莲娜那样赤裸裸地当着大家的面宣称：“对，当然我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但他实际上是在同样坚决地干着莲娜所干的勾当。当莲娜要乘他母亲病危把手伸向母亲的房子时，他不但“丝毫不感到愤慨和痛心”，反而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他想的仅仅是生活的冷酷、无情”，而莲娜“只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莲娜当然是今日苏修社会现实的一部分，而且这个社会里的宠儿。可是，为什么“生活”会是那么冷酷无情呢？这当然不是

由于人们“缺乏感情”，而是因为这种生活是由一种阶级关系、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尽管杰米德里耶夫不肯承认，今天的苏联社会，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了，一个新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着这个国家。但是他却也感觉到，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不受爱戴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错，而受爱戴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美德”。“高尚”意味着“无能”，“美德”不过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奢侈品。权势和金钱，这才是万能的上帝。路道粗、办法多的莲娜固然值得尊敬，而她的父亲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鲁柯扬诺夫则是更应该受到“爱戴”的。

其实，莲娜不过是鲁柯扬诺夫家族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成员，同她的父亲相比，就不免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才真正称得上是神通广大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才能比莲娜高，而是因为他是个当权派，手里有权，关系多，“老相识”也多。当他利用权力来为自己或自己的家族谋私利的时候，办法自然比莲娜要多得多，胃口大得多，手段也要“高级”得多。这种给营业员五十卢布之类的“低级”的事，他是不屑于做的。他要房子，难道还要找什么捐客，给他一百卢布吗？不，他可以不动声色地侵占别人的房子，如果被觉察了，那就“高傲”地离开，直到人家不得不再次发出邀请，才神气活现地回来。要知道，连他的老婆也是“一辈子从来不依靠别人”的。什么研究所的职位，没有他伊凡一个电话，谁也别想搞到手。女婿要，一句话就行了。他一到巴夫林诺沃别墅区，就有办法在这里装上电话。这里的阴沟坏了，多少年也修不好，他一来，工人有了，水泥有了，砖也有了，一个星期就修好了。女儿女婿的老屋子，一经过他的手里，立刻就奇迹似地变了样：地板发亮，门窗油漆一新，所有的房间都粉刷拷花，红的、绿的、蓝的，令人目眩。他干这些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象手里拿着一根魔棒似的，一挥舞就什么都从平地上出现了。至于这么多的钱、人工、材料从哪里来的，鬼才知道。

研究一下鲁柯扬诺夫一家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岳家是小生产者。这种小生产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伊凡本人原是个皮革工人，后来当上了厂长，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处分，显然是工人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但是在苏修叛徒集团统治下，他却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成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这在苏修统治集团里是很有典型性的。正因为他手里有特权，就可以很容易地把他所能控制的一切部门都变成他的私有财产。这些部门形式上还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却已经变成资本主义所有制了。你看那个“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的普鲁沙柯夫，就可以任意地把职位给予他想给的任何一个人，他就是这个研究所的主宰。他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的关系就是资本家同雇佣工人的关系。而这个凭一个电话就能指挥普鲁沙柯夫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就不仅是一个工厂、一个研究所的资本家了。他代表的也不只是一个家族，而是整个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早在苏联建国的初期，伟大的列宁就英明地指出：“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一代资产者的根源。”鲁柯扬诺夫一家，就是这新一

代的资产者的典型。苏修统治集团,上上下下不全是一些“鲁柯扬诺夫”吗?他们上了台,是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进口袋里去的。他们的魔爪和触须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鲁柯扬诺夫习气”象瘟疫一样在整个苏联恶性蔓延。

伊凡和莲娜这父女二代,体现的不是家族的血统关系,而是阶级的血缘关系。他们俩,一个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个则是在前者的卵翼下孳生繁殖、为数众多的新资产者。他们上下勾结,互相依靠和互相利用,实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剥削、奴役和压迫苏联人民。这就是今日苏修社会的残酷的现实。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新产生的资产者到处都在进行着莲娜式的“交换”的丑剧。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换”呢?

从表面看来,这出丑剧只不过是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作者似乎也企图把它归结为道德问题。其实,资产阶级从来也不会把这种“交换”看作是不道德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信条。这种交换不但是莲娜这类新资产者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交换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在物物交换的背后,掩盖着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莲娜这号人,就是要通过这种交换把自己发展成资产者,并且通过交换来扩大自己的资产。对于莲娜来说,房屋是资产,也是商品。房屋的交换也就是商品的交换。这种交换正是产生新的资产者的土壤。我们从小说里看到,在房屋交换过程中,除了交换双方,还有第三者——掮客。这类掮客在苏修社会中到处都有,他们“真象个干秘密工作的人”,“从不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别人。当有点什么事的时候,他自己会突然跑来的。”这些掮客,就是通过各种合法的、非法的交换和投机买卖变成新的资产阶级的暴发户。

其实,在苏修社会中,莲娜式的“交换”,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都进行着。“开后门”,不就是一种“交换”吗?当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为巴夫林诺沃别墅区领来工人、水泥、砖瓦,为女婿谋求研究所的职位的时候,他总是要通过某种东西去交换的。这正如杰米德里耶夫的母亲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在病危时对儿子说的:“这种交换经常地、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她还认为正是这种“交换”,把她的儿子杰米德里耶夫也“换过”了,“换定”了,换成了一个鲁柯扬诺夫了。其实,这个女人直到死也还没有觉悟到,被“换过”的并不只是她儿子一个人,而是整个苏联。在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被“交换”成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被“交换”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了。一切都“换过”了,一切都“鲁柯扬诺夫”化了。就以巴夫林诺沃别墅区来说,在老沙皇时代,这里是“老板娘、官太太、戴着圆顶礼帽的老爷”们的“休养圣地”。革命后,“红游击队员”们在这儿建立起“红游击村”。现在,到了勃列日涅夫新沙皇的时代,统治着这块地方的“换”成了“鲁柯扬诺夫”们了。所以,莲娜式的“交换”,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复辟狂澜中泛起的一个小小的泡沫而已。

挂羊头卖狗肉,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点。正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表面上还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一样,莲娜的这种“非法”交换也必须要有“合法”手续的掩护,特别是为了保障这种“交换”继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还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小说的结尾

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莲娜的房屋交换如愿以偿，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法学家”作了结论，证件都齐备，区房管局予以批准，“一切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还有没有不那么圆满的地方呢？有。虽然所有的“鲁柯扬诺夫”都爬进了他们的“安乐窝”，但可悲的是，这个“安乐窝”似乎并不那么“安乐”。就是那个神通广大的伊凡，直到死去都不得不“时刻戒备”着。他除了自己之外，对一切人都不信任，就连自己的老婆也唯恐她什么时候把他自己害了。资产阶级的内部关系，就象一群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这个人类社会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虽然在苏联如愿以偿地实行了反革命复辟，却坐到了一个火山口上。他们的“安乐窝”终究要被一旦喷发出来的人民革命的烈火所烧毁，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附：

交 换

（苏修中篇小说·节译和摘要）

工程师维克多·杰米德里耶夫的母亲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患了不治之症，但她本人不知道，还自以为是溃疡病正在痊愈。她和儿子不住在一起，自己单独住在莫斯科工会大街上，有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杰米德里耶夫和妻子莲娜、女儿娜塔莎住在莫斯科的另一个地方，也只有一个房间。维克多以前曾想和母亲搬到一起住，可是莲娜坚决反对，只好作罢。随着莲娜和婆婆的关系日益恶化，这件事也早已多年不提了。只有在夫妻双方发生争吵的时候，才会旧话重提，使这个问题成了他们家里发生纠纷时一种随时可以动用的绝招。当杰米德里耶夫为点什么事想要刺激一下莲娜，想指责她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时候，就说：“正因为如此，你才不愿意和我母亲住在一起。”而当莲娜想要挖苦或触触他的痛处的时候，她就说：“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要和你母亲住在一起，而且永远也不会和你母亲住在一起，因为你跟你母亲一模一样，你一个人就够我受的了。”

可是，这次莲娜一听说婆婆生了绝症，忽然决定立即同婆婆搬到一起住，而要这样做，首先要搞“交换”——用婆婆的一个房间和他们自己的一个房间去换一套两个房间的独门独户的住宅。这种做法，在莫斯科不是什么秘密；老人身体好的时候，子女们不愿意同老人一起住，而到老人快死时，就连忙交换房屋，搬到一起等老人死，用这个办法来扩大自己的住房。因此，当这天晚上莲娜提出和一家姓马尔古舍维奇的换房子时，杰米德里耶夫立即明白了莲娜内心的那个一眼就可以看透的打算。莲娜还冷酷地说，这件事得抓紧，每天都得张罗。最好是找个掮客。她的朋友柳霞认识一个掮客，那是个挺不错的老头儿。当然喽，这个老头儿从不会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别人。当有点什么事的时候，他自己会突然跑来的。真象个干秘密工作的人。他很快就该到柳霞那儿来的，因为柳霞欠他的钱。

莲娜一面说，一面铺着床。当莲娜转过身来的时候，杰米德里耶夫瞧了一下她的眼睛。从眼神里看得出，她的决心已下定了。看来她已经酝酿很久了。也许是当她刚知道母亲病情的第一天起，就打了这个主意。那时杰米德里耶夫忧心忡忡，跑来跑去找医生，给医院打电话，安排他母亲，那时他真是伤透了脑筋。就在这当口，莲娜却在那里想点子，打主意。就这样她找到一家姓什么马尔古舍维奇的。奇怪的

是,杰米德里耶夫此时丝毫不感到愤慨和痛心。他想的仅仅是“生活的冷酷、无情”。莲娜是没有过错的,她只是这种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冷酷、无情的生活的一部分。莲娜总是有这么个特点,她的内心有些麻木不仁。当莲娜的另一个非常强烈的特点——不达目的不罢休——起作用的时候,前面一个特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杰米德里耶夫对莲娜说,她本当等一等,让他自己来提这件事。如果他自己不提这件事,就是说不需要提,不能提,现在不该考虑这种事。

“维加,我懂,请你原谅。”莲娜鼓起劲说,“但是……(他看到,莲娜有些什么事难以说出口,但她还是会全部说出来的)第一,你自己提过这事的,对吧?提了好多次了。再说,调换房子这件事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需要的,首先是你的母亲。维加,我亲爱的,没有谁能象我这样了解你,疼爱你。所以我说,这是需要的,请相信我……。”

这天晚上,杰米德里耶夫发了一顿脾气,而莲娜对他一味忍让,还再三解释说她要这样做是为了大家好,为了女儿娜塔莎的将来。这种反常的态度说明她决心要和解,并且决心把交换房屋的事情做到底。尽管她也装出一种委屈的样子,但杰米德里耶夫知道,莲娜内心深处是满意的,最难办的事她已经办了——她已经说出来了。现在应该把伤口舔舔。不过这也不是伤口,只是抓伤了一点皮,而且是完全非抓不可的。就象打静脉针一样,拿起一小块棉花揉一揉,稍微有点儿痛,但以后就舒服了。而要紧的也就是以后舒服。

次日早晨,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还是互不理睬。杰米德里耶夫打了一个电话给母亲,母亲告诉他,她精神很好,血压正常。杰米德里耶夫情绪好了些,就去同莲娜说话。莲娜说,她情绪不好,因为她自己的母亲也病了。杰米德里耶夫明知岳母不会有什么大病,但他想,莲娜既然强调这个,大概是因为不愿再提换房子的事了。但莲娜在去上班以前,就象事情早已讲定的一样,叫杰米德里耶夫今天就去跟他的母亲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谈一谈,也就是预先通知她一声,这一、二天内就可能有人去看房子。而由于母亲目前住在杰米德里耶夫的姐姐洛拉处,所以杰米德里耶夫今天就去向母亲把工会大街上的房间钥匙拿来。杰米德里耶夫听了这话只是呆了一下,没有提出异议。他在前去上班时,途中自骗自地想道,既然母亲精神好些了,可能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他们要换一套单独的好房子,住在一起,换得愈快愈好,这是为了母亲的健康。这样妈妈的愿望就会实现,这不正是一种心理疗法吗?可以治妈妈的心病。其实,这种想法只不过是他自己欺骗自己的一种办法而已。这一点,杰米德里耶夫的心中是很明白的。

杰米德里耶夫的工作单位是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他面临着一次到秋明油田去的出差。由于在十月份这种潮湿寒冷的天气里没有人愿意到西伯利亚去,所以杰米德里耶夫想借口母亲有病推托掉而又推不掉。这一天,杰米德里耶夫又请求同事帕沙·斯尼特金代他去出差,帕沙拒绝了。平时,帕沙总是一直关注地询问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健康情况,告诉他许多医生的电话号码。总之,他是很同情杰米德里耶夫的。不知道为什么,杰米德里耶夫完全相信斯尼特金会同意代替他去出差的。但是他为什么会相信呢?究竟凭什么呢?现在明白了。他这样相信斯尼特金,是太愚蠢了。自然喽,人家表示同情,满怀热情而小心地问:哎,你们家的事情怎么样啦?这并不是人家虚伪——但不过这种同情和关心是有分寸的,就象鞋子和帽子一样,是不能够把它们过分拉长的。帕沙·斯尼特金在准备把女儿转到音乐学校去,这件麻烦事情只有他一个人能干。如果十月份他出差走了,那么音乐学校就落了空,这对她女儿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也使斯尼特金全家人失面子。我的天哪,一个是人快死了,一个是女孩进音乐学校,这两件事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是的,是的,可以的,如果快死的是别家的人,进音乐学校的是自己亲生女儿,那么这两顶帽子的尺寸就大致是相同的。

上午十点半,所长叫杰米德里耶夫去谈出差的事,杰米德里耶夫坚持母亲病危不能去,终于把这事推辞掉了。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立即又想起需要借点钱给母亲送去,因为他母亲请私人医生出诊,

一次出诊费就要十五个卢布(译者注:苏联名义上实行公费医疗,但由于服务质量太差,老百姓往往不得不自己花昂贵的费用请私人医生治病)。他在想着自己同事中有谁能够借得出这笔钱的时候,突然想到:怎样跟母亲谈换房子的事呢?因为母亲非常了解莲娜以前对这件事所抱的态度,而为什么现在莲娜自己倒提出来要住在一块。为什么呢?

当杰米德里耶夫想到这一点时,甚至出了一身汗。他走到走廊,那儿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电话。他就往莲娜办公的地方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急急忙忙前言不搭后语地把自己的难处讲了一通。莲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这么说,你是不想提喽!”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我实在不能跟她提这件事,你明白吗?”

莲娜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他,叫他过五分钟拨另外一个号码再给她打个电话,在那儿讲话比较方便。他打去了。这时莲娜大声而又果断地说:

“你这样讲,就说你很想换,而我反对,但你坚持要换,就是说不听我的,明白吗?这样一来就会很自然了,你妈妈也不会多心了,一切都推在我身上好了,不过说的不要太过分了——话里面稍微暗示一下……。”——忽然她换了声调,讨好地说……“对不起,请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好了!那你都明白了吗?好吧,再见!喂,维加,维加!你们那里有没有人顺顺当当地换过房子,跟他谈谈,听见了吗?再见!”

莲娜的话当然是很对的,也是很妙的,但是一种苦闷的感觉揪着杰米德里耶夫的心,使他不能马上就回到屋子里,就在走廊里徘徊了几分钟。

午饭后,杰米德里耶夫按照莲娜的嘱咐,在研究所里打听换房子的经验。有一个叫日烈霍夫的老头告诉他,第三设计室的涅维亚多姆斯基有这方面的经验。日烈霍夫说:“当时他岳母病得很重,是没有希望的了。她有一间很好的房间,差不多有二十五平方,在市中心。阿历克赛·基里洛维奇住在乌萨乔夫大街。事情不能拖,说换就要换。结果是办成了。你知道吗?非常成功!他会告诉你的,当然喽,他在区房管处有关系。一句话,是这么做的:他很快地办好了换房子手续,修理好了要搬进去的那套套房。——这是房管处责成他修的。——就和岳母一起搬了进去,房票簿也拿到了,过了三天老太太就死了。你明白吗?他呀,可怜的人哪,在那年冬天,可是够他受的。我记得他差点没病倒。可是现在他那套房子可是好极了,简直是将军住的房子,高级得很。有敞廊,两个凉台,还有其它各种辅助小间。他甚至还在一个阳台上种上了西红柿。您到他那里去,他会把一切都告诉您的。祝您成功!”

但是当杰米德里耶夫去找到涅维亚多姆斯基时,却碰了一鼻子灰。涅维亚多姆斯基装聋作哑,什么也不肯说,反而还把杰米德里耶夫奚落了一通。杰米德里耶夫忍住气不敢发作,只是在心里暗暗骂他“在岳母的坟上种西红柿”。

但接下去事情又顺利了。所里的一个女职员塔妮娅过去曾经和杰米德里耶夫非法同居过,至今不忘旧情,所以主动借给他二百卢布。他提前下班,到塔妮娅家里拿了钱,就乘车到母亲和姐姐住的巴夫林诺沃村去。

杰米德里耶夫家在巴夫林诺沃村的别墅,是他的父亲在大约四十年前造的。那时候,这个村里的主人们都是“红游击队员”,包括杰米德里耶夫的两个叔父在内。只有杰米德里耶夫的父亲不是红游击队员,而是个知识分子。他早就死了。在战前,这一带地方算是别墅区,如今莫斯科市区已在向这边伸展过来,周围变化很大。杰米德里耶夫提前一站下了电车,沿着一条河向前走,同时越来越不安地并且突然胆怯地想:跟母亲讲换房子的事是多么难开口呵,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难。和姐姐洛拉讲也是一样,可能跟她讲比跟母亲讲还要难。怎么办呢?自然他们将会猜到一切。不过,如果把事情说得象莲娜建议的那样,母亲也可能会猜不到,因为母亲是非常老实的。可是洛拉立刻就会明白的。洛拉反应灵活,眼光敏锐,她又很不喜欢莲娜。虽说母亲很不喜欢莲娜,但她仍然还是和莲娜和好了,并且学会了对莲娜的一

些事采取视而不见和宽宏大量的态度。洛拉呢，她却因莲娜对母亲的态度而年复一年地越来越不高兴。洛拉认为杰米德里耶夫已经暗中背叛了母亲和姐姐。有一回，姐姐说：“维加，你已经多么鲁柯扬诺夫化了啊！”鲁柯扬诺夫是莲娜父母的姓。

杰米德里耶夫在快要踏进老家门口的时候，忽然想到要仔细考虑一下最近的那件重要事。他没有勇气走进房子，就故意拖延时间，在河岸边坐了下来，望着对岸。

对岸的一切都是水泥一般的暗灰的颜色。游泳场后面是十年前新植的一片茂密的白桦丛。白桦丛后面白茫茫地象山丘似地耸立着一片楼房，其中有两座特别高。对岸的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好象“鲁柯扬诺夫”化了。每年都有一些细节的变化，然而，过了十四年后才发觉一切都彻底地不可挽回地“鲁柯扬诺夫”化了。不过，这也许并不坏吧？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变了，甚至河岸、河流、草地都变了，那也许是很自然的，而且也是应该的吧？

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婚后第一年住在巴夫林诺沃。他的姐姐洛拉那时还没有和费里克斯结婚。她和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一起住在莫斯科。别墅空着，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想单独住一阵。但巴夫林诺沃别墅的住宅早就荒芜了。屋顶漏了，台阶也烂了。最糟糕的是阴沟洞里的脏水总是漫出来，特别是在下雨天。难以忍受的臭气弥漫了整个住宅区，混杂着丁香、菩提和福禄考树的芬芳。居民们对这种混杂的气味早就习以为常了，这已成了他们的别墅生活的必然的点缀品。同时，他们心安理得地想：修阴沟是没有希望的，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谁也出不起。巴夫林诺沃村变穷了，住的也不是过去那些人了。以前的房主死的死了，跑的跑了。他们的继承人——寡妇和子女，家境相当困苦，过的根本不是什么别墅的生活。他们纷纷卖掉了自己那一份产权。这样，在住宅区就出现了一些素不相识的、和红游击队员毫无关系的人。就在这时，莲娜的父亲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鲁柯扬诺夫来探望新婚夫妇，作一天客。他说，在这个村子里修了三十年水管的技工卡鲁金是一个骗子、恶棍，他勾结定期来清理阴沟的清洁工人一起敲诈红游击队员们，他还说阴沟洞可以很快就修好，也花不了多少钱。人们都大吃一惊。大家凑了钱。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领来了一批工人，一个星期就都修理好了。红游击队员的后代们都很担心，生怕这个卡鲁金一怒之下离开村子，不再管他们了。可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不知使了个什么法儿使那个老酒鬼对谁也没有生气，而对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甚至满怀敬意，称起他“瓦西里奇”来了。

当时，一贯直言不讳的洛拉说，这大概是因为卡鲁金感到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是自己人。他从哪儿雇来的工人？从哪儿弄来的砖？水泥？显然是“开后门”来的。母亲听了很生气：“你怎么知道的？你有什么权利这样粗暴地毫无根据地诬蔑人家？”洛拉神秘地笑了笑，说：“嗯，不知道，不知道，妈妈。可能我错了。这只不过是猜猜而已。以后看吧……。”

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确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他的主要能耐就在于关系多，老相识多。半年后，他在巴夫林诺沃的别墅里装上了电话。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职业原是皮革工人。原先他在基尔圣诺夫城的一个老板那里干活。但从一九二六年被提为厂长——这是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厂主那儿征用过来在玛丽娜·罗霞地方的小厂——以后，他在行政职务上，就步步高升了。杰米德里耶夫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老态龙钟了，患着气喘病，还生过血管梗塞症。他饱经风霜和打击，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处分，后来又复职，提升。他对任何事情都是怀疑的，睡觉时异常警觉。这都已经习以为常，成了他的本能。以至于这在任何场合，在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表现出来。譬如，每晚入睡前，他总要问杰米德里耶夫：“维加，你把门钩搭上了吗？”“搭上了。”杰米德里耶夫回答着，听到岳父咄达咄达地从走廊走到门口那里去检查。（这已经是在以后，他们住在城里鲁柯扬诺夫家的时候。）有时，杰米德里耶夫实在厌烦极了，就大声说：“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说实在的，你到底为什么要问？”伊凡回答：“别见怪，亲爱的，我这是无意识的，没有什么坏心。”有趣的是，他对所有的人，首先是对朝夕相处的亲人的那种不信任也传染给了薇拉·拉扎列芙娜。有时，她从外面打电话来找莲娜，杰米德里耶夫回答说莲娜不在。过了一会儿，电话

铃又响了，薇拉故意变了嗓子又来找莲娜。有时，岳父和岳母在晚上互相给药，又象在演什么样的喜剧啊！

“伊凡，你给我的是什么药？”

“给了你要的那种药。”

“嗯，什么？究竟是什么？说呀！”

“我认为你要的是‘地巴唑’。”

“你给我的是‘地巴唑’吗？”

“对啊。”

“是吗？”

“你怎么提这种问题？”

“那末把你取药的那个纸袋给我。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好象不是‘地巴唑’……”

这种偶而听到的对话曾使杰米德里耶夫觉得可笑。岳父说起话来也是这种腔调：“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我要告诉你在这方面我自己体会到的一条公理。”或者是：“我自己从来都不机械地执行父亲的话，所以我要求莲娜也这样做。”大家都暗暗好笑。母亲称这位新亲家是“有学问的邻居”，这当然是在背地里。妈妈还认为他是一个聪明人，某些地方甚至讨人喜欢，虽然遗憾的是他根本不是个知识分子。他和薇拉·拉扎列芙娜是另一种人，是属于“会过日子的人”。可是，与另一种人攀亲也并不坏啊！好比注入了新鲜血液。可以利用别人的长处。不会过日子的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彼此感到苦恼，因自己“高尚的”无能而苦恼，然而他们在心底里却又以此而自豪。

难道杰米德里耶夫，或是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或者是杰米德里耶夫亲戚中的任何人能象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那样大胆利索地搞好别墅的修理吗？为了这件事，他还借给了钱。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婚后第一个夏天到南方去了。当他们八月份回来时，老屋子已经认不出了。地板发亮，门窗上白漆闪闪发光，所有的房间都花了很多钱粉刷拷花。一间是绿的，一间是蓝的，还有一间是红砖图案拷花。莲娜从他们新婚夫妇住的绿色大房间里搬出了破烂东西，买了几样最普通的但是新的家具：有撑脚的沙发床、学生用的小写字台、两把椅子、灯、窗帘，还有从其它房间拿来的两张虽旧但质量很好的布哈拉地毯。莲娜把一张毯子挂在墙上，另一张铺在地上。中间的那间蓝色房间里临时住着薇拉·拉扎列芙娜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他们来照料快要生孩子的莲娜，要住八、九两个月。在红砖拷花的小房间里住的是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有时洛拉也在这儿过夜。那时，洛拉和费里克斯已经开始了那漫长的恋爱，她顾不得到别墅来。外祖父，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父亲还活着，有时候也来作客。来时就睡在穿堂屋的藤榻上。

杰米德里耶夫很欣赏莲娜那种善于交际并且和人们很快就合得来的本领，而这一点正是他的不足之处。特别难得的是她总能结识一些用得着的人。刚在巴夫林诺沃住下，她已经认识了所有的邻居、民警局长、小船码头的看守。她已经和年轻的疗养院女院长用“你”互相称呼。女院长同意她到疗养院的食堂搭伙。这在巴夫林诺沃认为是最高的享受，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当住在半地下室的尼日涅娅·杜霞，以通常的蛮横无礼态度跑来要他们出清属于他们杰米德里耶夫家，但已被她强行占用十年的棚子时，莲娜是多么厉害地把她痛骂了一顿！杜霞飞快地从台阶上跳下来溜走，就象被风刮走了一样。杰米德里耶夫赞叹地对妈妈低声说：“嗯，怎么样？莲娜可不象我们那样软弱。”莲娜还善于觉察别人的弱点和值得取笑的地方，在当时的杰米德里耶夫眼中，再也不可能比莲娜更漂亮、更聪明、更有毅力的女人了。

但是在夏末的一天晚上，洛拉说：“维加，我有两句话跟你说……我和你谈谈莲娜，可以吗？别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都是一些小事。有些事使我惊奇。妈妈自己是绝不会说的，可是我看见了……。维加，你不会生气吗？”

“不会，不会。哪里的话！说吧！”

“嗯，这确实是一些荒唐而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莲娜把我们比较好的碗碟都拿去了。还有她把桶放在妈妈房门边……”（“天啊！洛尔卡竟说这些！”——杰米德里耶夫暗想。）他大声地说：“我没有注意。但我会对她说的。”“用不着，用不着。你没有必要去注意也不可能去注意每一件小事。”洛拉又有些难为情地笑起来。“我责怪妈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莲诺奇卡，我们需要碗碟，还有，请别把桶放在这儿，放到那边去。’今天，我说了。我觉得莲娜一点也没生我的气。说这些小事，真的，是非常不愉快的。但是，使我反感的是另一件事：不知为什么她把爸爸的照片从中间房间里摘下来挂到了穿堂屋里。妈妈觉得很奇怪。这点你是应该知道的。因为，这并不是什么生活琐事。我认为这简直是不懂人情。”洛拉沉默了。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地走着。最后，杰米德里耶夫说：“嗯，好吧。关于照片的事我跟她说一下。只不过，洛拉，如果你住到别人家里会怎么样呢？你就不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不合分寸的事情吗？”“可能。但不是这一类。总之，不要一声不响，而要告诉对方。我想这是正确的。而以后一切都会好的。”

关于照片的事他当晚没有告诉莲娜，到第二天早上才对她说。莲娜很惊讶。她把照片拿下来不过是因为需要钉子挂钟，这里面没有一点儿别的意思。她觉得很怪，象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自己不对她说，而要通过维加来说。这样就扩大了这些小事的意义。杰米德里耶夫说，关于这件事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根本没对他提起过。那是谁说的呢？“是洛拉。”他鲁莽地脱口而出。（后来，还有多少事被他鲁莽地脱口而出啊！）莲娜涨红了脸说，看来，他的姐姐充当了给她提意见的角色，有时自己出面，有时通过第三者。

那天，当杰米德里耶夫从城里回来时，别墅里异常地寂静。莲娜没有马上出来迎接，而是过了两分钟才出来，并提了不必要的问题：“要不要给你热饭？”洛拉到莫斯科去了。妈妈没有从房间里出来。后来，薇拉·拉扎列芙娜出来了。一副城里人打扮，扑了粉，高高挺起的胸部上戴着项链。她微笑着说：她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很感激主人的热情招待。他们一直在等杰米德里耶夫，和他告别。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马上就要雇着汽车来了。在房门打开的一刹那间，杰米德里耶夫看见父亲的照片已经挂在原来的地方。他问为什么他们突然要走？他们原来打算住过九月份的。一点不错，可现在他们有事要走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是有关工作上的，薇拉·拉扎列芙娜是家务事，该熬果酱了，而且总的说来，我们这些贵客也太讨主人厌了吧！……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无精打采地出来和亲家们告别，邀请他们再来作客。薇拉·拉扎列芙娜没有答应，她说：“我怕这不成，亲爱的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杂七杂八的罗嗦事太多了。有那么多的朋友想见见我们，也请我们到别墅去……。”

他们走了，但当天夜里莲娜就软硬兼施地迫使杰米德里耶夫次日一早去打电话邀请他们再来。莲娜还说，他们当然是不会来的，因为他们是很高傲的人。可是电话一定要打，这是为了洗刷良心。谁知杰米德里耶夫打了电话后，第二天他们就来了。他甚至还记得薇拉·拉扎列芙娜第二天来的时候穿的什么大衣，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右手提着大蛋糕，眼睛直视前方，高傲地走上台阶。

杰米德里耶夫大学毕业后，最初几年留在莫斯科一个煤气厂工作，每月工资只有一百三十卢布。有人多次介绍他到中亚细亚的地质勘探队去，母亲也希望他去，因为姐姐洛拉和姐夫费里克斯也在中亚细亚做勘探工作。但那时女儿娜塔莎已经生下，莲娜坚决不让杰米德里耶夫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事情就拖了下来。

从他学校毕业那时起已经过去四年了，然后，五年、七年、九年都过去了。娜塔莎已经上学了，是在乌丁胡同英语专门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对象，也是检验父母是否热爱孩子们并为此甘愿牺牲一切的尺度。这是另一个小天地，要进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除了莲娜谁也不能办到。因为她象一条猎犬，紧紧咬住自己的愿望不放。是这样一个外表可爱的，干草色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稍微

黝黑令人愉快的猎犬式的女人。在愿望(她用牙齿把它紧紧咬住)还没有变成现实之前,她是决不松口的。真是一种伟大的性格,一种优美的、了不起的、对生活有决定性影响的性格,真正的男子汉的性格!

多少年来莲娜孜孜以求的一个愿望,就是在“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找到一份工作。啊,“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象珠穆朗玛峰一样,耸入云霄,高不可攀。与人谈论的是关于“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打电话也是关于“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有时流下绝望的泪水,有时却闪烁着希望的火花。

“爸爸,你和格利高利·格利高利也维奇谈过关于‘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的事情吗?”“莲娜其卡,‘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给你来电话啦!”“从哪儿?”“从‘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哎呀,我的天,是从干部科来的,还是只不过是卓娅那儿来的?”她有两个生活安排得最理想的女朋友就在“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工作。终于,进“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的愿望实现了。“国际合作情报研究所”变成一块有血有肉的东西,被她放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嚼着,就象嚼一块炸透了鸡翅膀那样津津有味。在这里工作,又方便,又是按件取酬,地点又好——离国营百货商店只有一分钟的路程,顶头上司又是和自己在一个学校念书的好朋友,向她要求翻译多少,她就给多少。虽然后来她们吵架了,但三年里面一切都“OK”。午休时可以跑到商店里,看看摆出什么新式样的女短上衣没有;每星期四还放外国电影。但,遗憾的是她不能代替杰米德里耶夫写学位论文。那时杰米德里耶夫在煤气厂实验室工作,每月只能拿到一百三十卢布,而他的大学时代的一个熟人,同年级同学米特里(一个不怎么出色,但工作很卖力而且狡猾的年轻人,他拒绝任何个人享受,甚至在达到目的以前连婚也不结),收入却比杰米德里耶夫多一倍多,因为靠他那出众的“坐功”写出了那篇学位论文。莲娜非常希望杰米德里耶夫成为一个副博士。大家都有同样的希望。莲娜帮他学习英语,母亲对此也赞许;晚上,娜塔莎说话也是悄悄地;岳母做事也是轻手轻脚的。但是过了半年他就吃不消了。他感到精力不足,每天晚上头痛,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躺下睡觉。这时,他仇视学位论文这套东西。他对人说,还是老老实实拿一百三十卢布,这比受罪、损害健康、低声下气地求教别人好得多。莲娜现在也有同样的看法,并且轻蔑地把那些自己熟悉的副博士称作投机家、门槛精。就在这时,再凑巧不过了(也许是并不凑巧),冒出个杰米德里耶夫的远亲廖夫卡·布勃利克来,想进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简称为“吉涅加”工作。

廖夫卡从巴什基尼亚回来后,好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来终于打听到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有个位置。但要进去还得想办法。如果不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给普鲁沙柯夫打电话,不管廖夫卡,还是其他什么人都进不了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后来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甚至坐着公家的汽车亲自到普鲁沙柯夫那里去。本来普鲁沙柯夫是给另一个人留着这个位子的,但经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一施压力也就同意了。最后,进了这个研究所的不是廖夫卡而是杰米德里耶夫。这是个工作轻松、待遇优厚的职位嘛!归根结底,终究去普鲁沙柯夫那儿的不是廖夫卡的岳父,而是杰米德里耶夫的岳父啊!后来,廖夫卡的老婆伊诺其卡当着朋友们的面给莲娜来了一通。她喊叫:“你这个人真可恶!”但莲娜对此很理智,表现得克制、冷静。朋友们都说莲娜的气量大。她一切都自己承担下来。她说杰米德里耶夫并不想进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是她坚持让他去的。“是我的过错,是我一个人的过错,不能怪维加!莫非你们要我们过那一百三十卢布的日子,还叫维加在路上花三个小时吗?”

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当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来告诉他们国立石油天然气设备研究所的这个位子是怎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首先起意让杰米德里耶夫到那里去的是莲娜。杰米德里耶夫本人确实是不想去。他三夜没睡好觉,拿不定主意,心里很苦恼……。但是,那件想都不应当想,别说去做的事却慢慢地变成一个小小的包扎得很好的东西,就象是一颗胶丸,不管它含有什么脏东西,应当(这对健康来说是必要的)一口把它吞下去。好在谁也不会发现包在里面的脏东西,而大家都在吞服着。“我尊敬廖夫卡”,莲娜说,“甚至爱他,但不知为什么我更爱我的丈夫。既然我的爸爸,一个最不愿意欠下人家情面的老人,

下了决心去说情……”

本来应当马上告诉廖夫卡夫妇，但没有足够的勇气——就这样拖着，回避着不答复人家。后来廖夫卡从侧面打听到了。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断绝了往来，也不通电话。过了四、五年以后，有一年冬天，二月底，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生日的时候，这件事又重被提了起来。母亲和外祖父早就埋怨过杰米德里耶夫，但并不太厉害，因为他们也认为一切都是莲娜的过错。那么向莲娜问罪吗？不行，对于莲娜他们只能容忍，就象对坏天气一样，这是毫无办法的。但是，就在母亲生日那一天……

这一切是那么清楚，历历如在眼前，那一天杰米德里耶夫、莲娜、娜塔莎登上楼梯，在门旁站住了。娜塔莎手里拿着礼物——一盒糖果，一本英文版的萨克雷的《名利场》。莲娜肩靠着门，闭着眼，好象是自言自语地，但当然是说给杰米德里耶夫听的，轻轻低语：“哎呀，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好象在说：为了你，我要去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啊！杰米德里耶夫习惯地有些紧张起来。莲娜不喜欢到婆婆家去，一年一年变得越来越勉强了。有啥办法呢？唉，她不喜欢去，不能去，她受不了，一切都会使她恼火。不管给她吃喝的多好，也不管用怎样亲密的语言和她讲话，就象在马路上装暖气一样徒劳无用。杰米德里耶夫抱着女儿，故意温和地对她说：“怎么样？小宝贝，来奶奶这儿满意吗？”“嗯！”“你喜欢来这儿吗？”“喜欢。”而莲娜笑着补充道：“喜欢，可是要对奶奶说：我应当早些睡觉。你要说，不要让爸爸坐的太久了，免得把他从桌子边硬拉出来。你说，九点半我们就要动身回家！”

如果不是那个傻瓜表妹玛丽娜，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当他一看到玛丽娜涨红着脸坐在放着馅饼和华夫饼干的桌边时，马上就知道，一定要出事了。莲娜比玛丽娜要聪明得多，但某些地方她们又很相象。于是当家庭聚会而见面的时候，他们常常会碰起来。有时明争，有时暗斗，很巧妙地互相挖苦着，旁人是在发现不了的，就象水球运动员在水下互相踢脚一样，观众是觉察不了的。往往要到了夜里，莲娜才突然提出使杰米德里耶夫莫名其妙的问题：“为什么你表妹整个晚上都在挖苦我？”“怎么挖苦啦？”“你没听见？”“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吧，譬如：她讲到东方女人，讲到她们的臀部和腿。这点你也没听见吗？”“对不起，可你好象并不是东方女人呀！”“哎呀，和你说什么好呢？”

那还是发生在二月份的事情，不知为什么每句话都记得很清楚。也是从完全看不出恶意的、水下踢脚开始的。他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这是莲娜最后一次到母亲那儿去作客。从那次以后从未再去。五年里一次也没有去过。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有时还顺便来看看自己的孙女，而莲娜是不到她家里去的。“你生活得怎么样啊？玛丽娜，还是象以前一样吗？”“当然，还是那样，你现在怎么样啊？还是在那儿服务吗？”这些话是笑着讲的，而且符合礼节。但实际上的意思是：“怎么样，玛丽娜，还是象以前一样没有人上你的钩吧？我相信，永远也不会有人上你的钩的。我亲爱的老姑娘。”“我对这个是不在乎的，因为我过的是创作生活，不象你那样，你只不过是给别人服务，而我是搞创作的。”玛丽娜当时在出版社当编辑，现在她在电视台工作。“最近你们有些什么好作品出来吗？”“出了一些。哎，你的衣服是什么料子的？是在国营百货商店买的吗？”这些话都是婉转地互相挖苦：“你在胡扯些什么创作啊？你难道亲自编过或者出版过一本好书吗？”“是的，当然是。但是和你谈这些事没有什么意思，你对这些是不会感兴趣的，你所感兴趣的是那些吃喝穿戴。”她们还争论过有关“诗”和“世界性的市侩哲学”问题。玛丽娜很喜欢谈论类似这种题目，从不放过挖苦和讽刺市侩的机会。吓！这些市侩们！当她听到有些人不承认毕加索和雕刻家艾利秋的成就时，她就会气势汹汹、唾沫四溅地说个没完。

对玛丽娜来说，一切可恨的东西都可以归结到“市侩”这个字眼里，而对莲娜来说却是“伪善”。“这一切都是伪善的”。玛丽娜惊奇地说：“伪善？”“是的，是伪善”。“热爱毕加索是伪善？”“当然罗，因为有些人表面上热爱毕加索，而他们常常是根本不懂毕加索。这就是‘伪善’。”“我的天哪！快扶住我吧！”玛丽娜哈哈大笑地说，“热爱毕加索是伪善。啊哟！哟！哟！”她们两个脸红耳赤，两眼冒火，可以看出不是

在开玩笑了。什么毕加索！什么梵高！升华！加速！保尔·杰克逊！至于那一个是保尔·杰克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并不重要，因为都是伪善！伪善！伪善，伪善。那么你解释一下：你所认为的伪善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一切不是出自内心，而是别有用心，为了达到显示自己的目的，都是伪善。“噢，照那么说，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姨妈过生日，你带着糖果来看望她，你也是在搞‘伪善’？”

莲娜含着微笑看了杰米德里耶夫一眼，这种笑包含着胜利者的姿态（好象在说，我早已料到，而你偏要来，那么你就去领教，去受用吧）！她说，她和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关系确实不太好，但她不是出于“伪善”来向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祝贺，而是因为维加求她来的。以及类似这样的话，以后的就记不清楚了。客人们都散了，妈妈跑出跑进送他们。然妮娅姨妈讲起了有关廖夫卡的事。为什么要讲这件事——不明白。然妮娅经常想把事情做得好一些，但得到的效果却是相反。妈妈说，这件事真令人气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相信维加会这样做。“哟，照您说，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和你的维加毫无关系吗？”“我并没有为维加说话啊。”“但说来说去总是我的过错？！”莲娜的两颊突然绯红了，而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对，当然我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您的维加是个好孩子。是我把他教坏了。”然妮娅姨妈摇了摇头那苍白的头，善意地说：“亲爱的莲娜，是你自己向廖夫卡这样解释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解释又怎么样呢！我是为了关心自己的丈夫，而你们没有，没有……。”“不要大喊大叫！”“你真是吃里扒外！我不和你讲。”莲娜一把抓住娜塔莎，从桌子后面冲了出去。“为什么他们欺侮我的时候，你总是不吭声？”接着她就下了楼梯，跑到了外面，再也不来了。

杰米德里耶夫追了下来，在结冰的水洼上追赶着，直打滑。莲娜和娜塔莎推开了他，跳上了无轨电车。车门关上了。杰米德里耶夫不知道上哪儿去，以后又怎样。现在家里搞得四分五裂，他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哪儿也不能去。但是，在二月的事情发生后，莲娜还曾到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这里来过一次。因为没有办法了。当时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得了脑溢血，丈母娘整天整夜地服侍着他。而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到“金沙滩”的休养证马上要过期了，娜塔莎没有人照顾。

在保加利亚，每天傍晚杰米德里耶夫和莲娜都穿着贴身的高领衫出来散步，两人相亲相爱。虽然放下窗帘，旅馆的房间在白天还是被晒得很热，淋浴龙头里的水也是热的。他们之间从来也没有这样相爱过。

杰米德里耶夫坐在河边想完了往事，终于硬着头皮走进了家门。姐姐洛拉和姐夫费里克斯正在厨房里忙着用布条糊窗缝，因为冬天就要来了。他们对杰米德里耶夫说，四点半的时候，母亲的病情恶化了。另外，地质队里一再来电报叫他们俩一定要在十一月底赶到中亚去。洛拉不愿去，因为她要照顾母亲。费里克斯坚持要她去，因为这儿有杰米德里耶夫在，他是亲儿子。杰米德里耶夫乘机就把换房子的想法告诉了姐姐，并且说这样一来就可以由他照顾母亲了。洛拉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用意，脸上露出了痛苦和愤怒的神色。

这时，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在房间里听到了儿子的声音，就叫他进去。母子俩在谈着家常时，杰米德里耶夫被叫出去听电话。来电话的是莲娜，她催问丈夫，房间钥匙拿到没有。杰米德里耶夫只好又对母亲谈起了换房子的事。克赛尼亚·费多罗芙娜沉默了一会，说，她过去曾经很想跟儿子和孙女儿住在一起，但现在不想了。她平静地看着儿子，又说：“维加，你已经换过了，换定了……”又开始沉默了。她闭着眼睛低声地讲些莫名其妙的话：“很久以前就换过啦。这种交换经常地、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因此你不要感到奇怪，也不要恼火。维加，这是不知不觉地……。”

（下转 49 页）

由“结合部”想到的

——看电影《渡江侦察记》的一点感想

上海味精厂工人 杜恂诚

《渡江侦察记》有一个情节：侦察小分队由于发报机被敌人的炮火炸毁，跟江北我军指挥部的联系中断了。为了确保我百万雄师胜利渡江，必须及时把一份重要情报送到对岸。而敌人疯狂地包围了这支侦察小分队，并且加强了江边哨卡。从哪个地点突破封锁线泅渡过江呢？连长李春林英明而果断地选择了敌军两个师驻地的交界处——“结合部”。这个“结合部”以“灯标为界”。用敌军长的话来说，“灯标以东是六十六师管的，灯标以西是六十八师管的。”这两个师的防地虽然靠在一块，却各自为政，界限分明。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对“结合部”阵地的防守，必然互相扯皮，推诿责任，造成了空隙和破绽。我们的侦察英雄就是利用了敌军内部的这种矛盾，抓住了他们的致命弱点，声东击西，乘虚而入，让吴老贵和小马突破敌人的封锁，回到江北。

这一生动的情节，倒使我们联想起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动人事迹。

前些时，我们参观金山石油化工总厂的宏伟建设工地，也看到一种“结合部”，一种同《渡江》中描写的刚好相反的“结合部”。金山工程要造一条几十公里长的铁路。铁路的地基由近二十个公社的五万民工分段包干。这样在公社与公社之间，大队与大队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几米长的“结合部”。在检查施工质量的时候，发现凡是“结合部”，地基夯得特别结实。什么道理？原来各个分段的民工们都想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都把几米长的“结合部”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这个队夯实了，兄弟队又来夯一遍，结果“结合部”的地基就显得特别结实。民工们在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鼓舞下，自豪地称“结合部”的夯土为“团结夯”、“风格夯”。这才是名符其实的“结合部”呢！

这两种不同的“结合部”的鲜明对比，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极其深刻的。

《渡江》中的情节，乍看起来带有偶然性。细细一想，却包含着深刻的必然性。它真实地反映了敌军的内部关系的客观规律性。国民党反动军队，代表着一个最反动最腐朽的阶级。这个阶级正处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土崩瓦解的境地之中。它们的内部关系，必然是四分五裂，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各怀鬼胎。什么六十六师、六十八师也好，还有什么情报处也好，都是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上上下下的大小头目，也都是些土皇帝。有功可争时，他们就拥上来“抢篮球”；无功可报时，就彼此“踢足球”。你看影片《南征北战》里

的敌军李军长和张军长，一个声嘶力竭地叫喊：“向我靠拢”，一个色厉内荏地回答：“向我突围”，他们各自都以“我”为中心，结果尽管机关算尽，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我们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在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为什么有红色政权的发生和存在？原因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当时各派军阀封建割据和长期混战，使他们的“结合部”成为地主买办阶级反动统治的最薄弱的地区，使得红色政权能够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来并长期坚持下去，发展壮大。一切的反动没落阶级，包括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他们之间的勾结总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他们的争夺总是绝对的、一贯的。一切反动剥削阶级又都植根于私有制。他们的世界观归根到底都只有《红灯记》里的鸠山所说的两个字：“为我”。因此，他们内部的各个集团，必然“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也是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与反动剥削阶级及其腐朽的社会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制度。金山工地上发生的动人事迹，在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战斗洗礼的新中国，可说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它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内部的一种崭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人人传颂、处处开花的“龙江风格”，就是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结下的思想之果。在我们的时代，哪里有“结合部”，那里就有“龙江风格”。正如革命样板戏《龙江颂》所描绘的：“手心手背都是贫下中农的肉，山前山后都是人民公社的田”。无论是山前山后、上游下游，联结成一个阶级的整体。为了革命的全局的利益，保住社会主义的“大帅”，每一个局部都可以承担最大的牺牲。有人把这种风格称之为“憨大”。上海焊接二厂的工人豪迈地说，我们就是乐于做革命的“憨大”。让“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类剥削阶级的旧观念见鬼去吧。“一根杠棒前后肩”，“我的工种就是干革命”，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精神境界。今天，不是到处都出现“不务正业”的人吗？当医生的去研究医疗器械，做灯泡的工厂却去造一点电视机，工人师傅做了业余教师，甚至到医院就医的病人，也会主动替自己的劳保医院承担试制和修理医疗设备的任务，病人的单位成了劳保医院的“医院劳保”了。有人说他们是“百有份”。他们说，“百有份”不够，我们要做“千有份”，“万有份”。好！这是多么崇高、多么自觉的主人翁的态度啊！“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

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扫除一切植根于私有制的剥削阶级的观念。当然，清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一切反动阶级及其腐朽观念都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孔老二的幽灵，还随时企图借尸还魂，污染我们的革命空气。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被巴掌山挡住双眼的李志田式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也仍会不时冒出头来。但是，社会主义的新的生产关系，毕竟如旭日东升，光焰万丈。正如没落的蒋家王朝阻挡不住我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样，一切旧的上层建筑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终究是要被消灭的。谁要是还怀疑这一点，那就让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的步伐来回答他们吧。

“两泵”对比以后……

——上海水泵厂访问记

四年前，报上发表了《第一水泵厂和上海水泵厂的对比调查报告》。说的是，第一水泵厂，厂小，条件差，群众充分发动了，生产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上海水泵厂，厂大，条件好，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生产连年徘徊不前。

现在，上海水泵厂的面貌怎样了？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这个工厂。从厂里提供的统计报表中，我们看到了几个令人兴奋的数字：四年来，这个厂生产连续跃进，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左右。如今一年的产量，就等于四年前的两个半厂。产品也从一般的清水泵，发展到国家急需的电站、石油化工、采煤和造船工业上用的泵，品种扩大一倍半。过去不能生产的压力高、流量大、扬程远的新产品，现在已经成批投产。

工厂还是原来的工厂，工人还是原来的工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能够从踏步不前到大步跃进呢？通过调查访问，我们从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促进生产关系特别是干群关系的改善中，找到了这个厂为什么面貌发生变化的答案。

“油门”在哪里？

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个厂四年来走过的路程吧。党委书记黄成宰对此是很有感触的，他说：“我们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了一场改变工厂落后面貌的翻身仗，首先是我们干部打了一场向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攻仗。”情况确实是这样，《两泵对比调查》一发表，全厂上下震动很大。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有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厂里为什么会造成落后，又应该从哪里着手改变面貌，认识并不一致。有些干部认为：“要是我们厂的生产搞得不好，也就不会有这个《对比调查》了。”有的认为：“只要我们把生产搞上去了，路线也就对头了。”由于存在这种错误思想，他们一个劲儿埋头抓生产，在大会小会上发号召、敲指标，一心想的只是水泵台套、产值数字。为了想把生产搞上去，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些干部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批判过的“管”“卡”“压”的一套重新捡了回来，有的到浴室门口站岗放哨，到厂门口检查出入证，看谁迟到早退。有的跑到

广播室叫喊：“加强劳动纪律”，“不要搞无政府主义”……。这样，一九七〇年最后一个月，生产虽然拚上去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年初，生产又落下来了。这时，干部象泄了气的皮球，有的说：“我们厂的工人，要是先进厂工人那样的干劲，早就摘掉落后的帽子了。”有的说：“我已经用足了力气，把脚踏在发动机的‘油门’上，可就是群众发而不动啊！”

广大工人群众也在那里着急。他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许多工人学先进，揭矛盾，找差距，批评干部遇事不同群众商量，千错万错，错在“只抓钱、不抓线”，只抓泵、不抓纲，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工人们还积极地向领导上提出了三百多条改进意见。许多工人说：“我们同先进单位一样，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都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为什么先进厂工人能够做到的，我们就不能做到？”有的工人还说：“你们干部的脚步不是踩在‘油门’上，而是踩在‘煞车’上，把我们工人的积极性给‘煞’住了。”

踩“油门”还是踩“煞车”，它反映了干群关系上的矛盾。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有些干部所以满眼看到的都是一些不团结、劳动纪律松懈的现象，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形势，看不清群众中的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因而就不能自觉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把工厂的革命和生产搞好。这个厂的革委会生产组徐元达同志的体会，说得很正确：“要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对我们干部来说，有一个从思想感情到工作作风的转变过程。”他举了一件发生在一九七〇年的事情。当时，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这个厂尽快试制十二万五千瓩的电站泵。这种新产品的技术工艺要求很高，一台泵的工作量等于五十台农用泵。因为任务重要，上海又没有第二个厂生产大型泵，老徐只得把合同签订下来。但是，他把工时、设备账左排右算以后，认为无法啃下这块硬骨头。再加上别的重点产品任务也很重，结果，一拖就拖了三年。到了一九七二年八月，闵行电厂一台新建的十二万五千瓩汽轮发电机组计划年底发电，要求他们再突击生产一台同样大型的电站泵，并且说，别的设备都已落实了，就是急等着这台泵安装。离年底只有三个月了。三年没有试制出来的新产品，怎么能够在三个月里完成呢？老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急得团团转。

干部认为“没有办法”的事，广大群众是不是也不能解决呢？那时，厂党委组织干部正在学习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批判林彪宣扬的唯心史观。老徐的思想有了提高，就下车间试着去找工人商量商量看。他先到第一道工序的木模间，吞吞吐吐地说：“我讲几句外行话，你们不要笑，‘一二五’电站泵要提前在十一月份交货，做木模的时间要……”他讲不下去，生怕工人批评他去压指标，把他顶回来。却不料工人一听说有突击任务，纷纷围拢在一起，催促他把底交出来。老徐只得壮着胆，继续说下去：“一二五”工程早上去一天，它发的电可以多炼四千五百吨钢，或者灌溉三十万亩农田。工人马上议论开了：“这么重要的泵，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你说这块骨头硬，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工人的革命志气比它更硬？国家建设急需的产品，我们就是用手抠也要把它抠出来。”当场工

人们一商量，保证三个星期里造出木模。

走到群众中去，果然找到了办法。但是，从脱离群众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需要经历激烈的甚至是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老徐回来以后，又想：以往做一套木模至少得两个月，这次工人要缩短到二十天，果真能行吗？越想越放心不下。他一连几天到木模组去，第一天，发现木模工人已经按照各人的技术特长进行分工，把任务一一落实了；第二天，走到磨锯条的老师傅面前，看到他们早已把准备工作做好了；第三天再去时，工人正紧张地在下料了。结果，工人提出二十天保证完成的任务，只用了十八天时间就把全套木模送到了造型组。以后，老徐逢人便说：“我自以为是熟悉生产情况的，可是，怎么也计算不出工人群众有这么大的积极性啊。”

要问群众中这股子劲从哪里来？工人们说得好：“这是我们对林彪污蔑‘我国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谬论的坚决回击。”老徐也说：“工人同志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群众路线课，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依靠群众不能半心半意，而要真心实意。”认识提高以后，他和别的干部一起，深入生产第一线，遇事同群众商量，经过四十天奋战，提前完成了原来认为不能完成的两台大型电站泵。

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就要经常想一想：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他们的集体智慧和经验又是什么，并且把它正确地集中起来，组织大家同心协力地去做。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洗刷掉林彪、孔老二鼓吹的“领导高明”的唯心精神，才能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使群众的积极性象‘油门’发火一样，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

究竟“难弄”的是什么？

广大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了，许多艰巨的生产任务一个接着一个完成了。但是干部依靠群众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遇到一些所谓“难弄”的群众和“难弄”的问题时，有些干部中那种认为有些群众就是发而不动的思想又重新回潮了。

铸工车间党支部书记朱道盛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他体会很深的一件事情——

那是一九七〇年寒冬腊月的一个深夜，更衣室的玻璃窗不知被谁打破了。老朱知道后气呼呼地说：“谁搞的无政府主义，要查一查，批一批，不服的话，还要斗一斗。”他怎么想到要“查、批、斗”呢？说来也事出有因。车间里曾经有两个坏家伙，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生产，后来，发动群众一查，把他们揪出来一批，正气抬了头，群众很高兴，生产很快上去了。从此，他把“查、批、斗”作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一条经验。可是，这一次，一查却查到一个姓朱的青年身上。这个青年在干部眼里是既调皮又难弄。当时，干部正急于要改变厂里的落后面貌，又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碰到这件事，老朱就认为这下可有了个“典型”，要好好批一批、斗一斗了。可是，实际情况恰恰不是象老朱所想的那样。原来，那天车间正在突

击一批重要水泵的翻砂任务。下班后，几个青年继续突击，夜深了，别的青年都走了，只剩下小朱一个人，他想：“在完成任务的关键时刻，我就是上得去，拚得出。”他一个人敢打敢拚，直到做完最后一只泵体砂模才歇手。当他走出车间回宿舍时，更衣室的门却被“铁将军”把牢，进不去，他满身汗水被冷风吹得打颤，迫不得已，敲破了玻璃窗爬进去，才换了衣服出来。小朱一想到自己一心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反而遭到领导的一顿批评，真是又委屈又泄气，一股热情象泡在冰水里。从此，他遇到领导就绕开走，整整四年不和老朱讲话。

对于阶级敌人散布的歪风邪气，对于资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就应该敢于批，敢于斗。可是，小朱的错误，却根本不是这种情况。由于老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还用老眼光看人，事先又不过调查，看不到小朱下班后继续突击完成任务的先进事迹，反而把敲碎玻璃窗当做“歪风邪气”，用“查、批、斗”的办法来对待，结果，把群众的积极性都查掉了，批掉了，斗掉了，这样几次一“查”、一“批”，群众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

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帮助老朱提高了认识。毛主席说：“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这一伟大教导，使老朱认识到，只有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才有利于促进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团结，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他说：“我嘴上也讲要依靠群众自觉，可是，在思想深处，却有一个例外：以为有些小青年调皮捣蛋，不整一整改不了，不管得紧些，他们就不听话，这样，不仅忘记了领导的责任，也把自己放到这一部分工人的对立面去了。”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有形的“管”“卡”“压”修正主义管理制度冲掉了，但无形的“管”“卡”“压”的旧思想，还会残留在人们的头脑里，往往又会把修正主义的一套重新搬了出来，压抑群众的积极性。

我们在铸工车间进行调查访问时，高兴地听到群众说：老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同工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批判“上智下愚”的孔孟之道，领导作风有了可喜的变化。他主动地排出曾经被他查过、批过的三十多位工人的名单，一个一个地找他们谈心，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当老朱向小朱作检查时，小朱很感动，也对自己打破玻璃窗，损坏公物的行为作了自我批评，几年没有打开的锈锁打开了。从此，小朱心情舒畅，干劲更足，现在还被推选为青年突击队队长。领导思想作风的转变带动了大家，全车间工人积极性焕发出来，生产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纪录。

对待群众搞“查、批、斗”，会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当然不对，但是，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绕开矛盾走，不去碰它，是不是就能够发挥或者不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呢？三车间党支部书记吴明达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体会。

这个车间长轴组的二十六个工人，有六对闹不团结。团结搞不好，革命大批判搞不起

来,生产也上不了坡。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老吴,懂得搞好团结是个关键,但是又想,这个问题难弄,如果抓上了手,好比湿手捏面粉,抓了放不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人尖锐地批评老吴只抓生产,不抓政治思想工作,说他“看见高产咪咪笑,碰到矛盾绕绕道,大事挂在口,生产落在手”。这样一来,矛盾再也不能绕开了。党支部经过讨论,决定办起学习班,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和增强革命团结的指示,深入批判林彪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罪行,并对小组内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真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四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矛盾解决了。从此,全组团结协作的风格发扬了,一连四次刷新生产纪录,从“疙瘩小组”一跃而成为全厂的先进小组。事后,老吴深有体会地说:“一只只水泵是看得见的,人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却是摸不着、看不到的。不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矛盾解决不了,生产也就搞不好。”

怎样看待群众的革命监督?

革命和生产形势在不断向前发展,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断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是否已经完全解决了呢?上海水泵厂的干部根据自己的体会,回答说:工人群众的觉悟在不断提高,对领导工作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如果干部放松了思想革命化,不努力学习提高,干群之间又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在这个厂里,随着工人群众觉悟的提高,出现了工人自觉地要求对干部进行革命监督的社会主义新事物。许多干部说:“我们克服了群众‘难弄’的思想,又出现了如何接受群众监督的新问题。”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厂的干部是如何接受群众提出的这个新课题吧!去年春天,四车间工人理论小组派出几个青年工人来找干部谈话,要干部谈谈参加生产劳动的体会和存在的问题。有个干部看了来找他的青年工人一眼,随口说:“你代表谁来的?”青年工人回答说:“我们代表小组的全体工人。”工人群众能不能检查和监督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这个问题不但许多干部没有想到过,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派出代表检查干部参加劳动情况的四车间工人理论小组中,也曾经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当时,他们正在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革命导师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提出要注意防止国家机关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后来,他们又学习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的教导,大家说:对于这样一件反修防修的大事,我们工人就应该管。大家联系实际,讨论了一个提纲,分头去调查厂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了解干部在劳动中是怎样抓革命促生产的,又是怎样帮助班组解决问题的。几天以后,一张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调查报告就公布出来了。在调查报告中,工人们既肯定了《两泵对比》以后干部参加劳动有所进步的基本的一面,同时也指出,有些干部劳动了三个月,却一次也没有在工人学习和批判会上发过言,工人批评说,这是“身在群众中,心在群众外。”

这件事引起了全厂的争论。大多数同志认为“好得很”，说这是工人帮助干部抓路线、管路线。但也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工人“管得太宽了”。有些干部则认为：“过去只想过干部管工人，却从来没有想到工人也来管干部。”对于工人群众这种可贵的首创精神，要不要支持？

为了统一干部的认识，厂党委专门开会讨论。大家首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干部不坚持参加劳动，有的甚至连生产什么水泵的名字也叫不出来。由于没有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因而也就失去了联系群众的有力依靠。现在，工人群众主动调查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不正说明广大群众对干部的爱护和对企业是否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关心吗？工人群众和干部一起抓路线、管路线，这种“管得宽”，不正反映了群众高度的自觉性吗？群众这种革命的自觉性越高，越是要求干部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也就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干部通过讨论，统一了认识，就向全厂群众公开检查了干部对参加劳动的认识，并进一步订出了具体措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厂党委副书记李文华说：“干部能不能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同干部的世界观改造是紧紧联系的。当我们能够严于解剖自己时，这种革命自觉性就高些；否则，自觉性就差了。”

一九七四年年初，公司在厂里召开抓革命、促生产的现场会，表扬这个厂打破了历史上年初不出成品的常规。不料，会议未散，工人们却在会场门口刷出了一批揭矛盾、找差距的大字报。工人们通过事先调查，在大字报上揭露说：一九七三年的产值产量计划虽然超额完成了，但是，还有一批重点产品的任务完成得不够好。大字报督促领导既要抓产值，又要保重点，要摆正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全面贯彻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当时，厂里一些干部感到突然：为什么早不揭、迟不揭，偏偏要在许多兄弟厂同志在厂里开会的时候揭？党委针对这个思想又进行了讨论，认为：工人群众这些大字报，对干部头脑里的骄字敲起了响亮的警钟，好得很。后来，党委就向全厂提出“表扬声中揭矛盾，前进路上找差距”的口号。由于干部打掉了骄气，保持了旺盛的斗志，象煤水泵、涡轮机组、电站泵等等技术要求较高的产品，一九七四年比上一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

当我们离开这个厂的时候，全厂正不断出现新的气象：干部注意抓大事，工人群众也帮助干部抓大事；干部到班组来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工人也主动找干部提建议，想办法。遇到资产阶级歪风，工人敢于顶；出现先进思想和事例，大家自觉开展比学赶帮；干部中错误思想一露头，工人随时随地进行批评、监督。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总结上海水泵厂四年来发生变化的经验，那就是：路线端正了，干群关系改善了，生动活泼的局面才能形成，生产也才能蓬蓬勃勃地发展。上海水泵厂改变落后面貌的生动事例，对于其他一些目前还处于后进状态的单位来说，不是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么？

（本刊记者）

从找差距中明确了学大寨的方向

上海市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党支部

我们八二大队，在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推动下，一九七四年的粮食常年亩产量达到二千四百零八斤。这是我们连续十七年夺得农业生产丰收，也是第三个年头粮食亩产超过两千斤。最近，我们组织社员和干部讨论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时候，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同时也是由于大寨大队贫下中农为我们作出了榜样，鼓舞我们奋勇前进。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成绩，向自己提出什么样的先进目标，又应该怎样坚定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迈步前进，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呢？我们一面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教导，一面从各个方面寻找同大寨大队之间存在的差距。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差距吓一跳。这一找，大破了我们有些同志头脑里那种“办法想尽，措施用尽，潜力挖尽”的自满情绪，使全大队广大社员和干部打开眼界，进一步鼓起了大干快上学大寨的热潮。

差距先是从改造自然条件上找起的。原来，我们总以为经过几年的治水改土，先后疏通了八十二条断头浜，给一千多亩土地盖上了一尺多厚的河泥和草塘肥，把“盐碱地”和“铁板砂”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田，工作能做的都做了，成绩已经很大了。但是，用大寨的自然条件和造地的成就进行对比，差距立即就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大寨是在海拔一千米的高山上，我们是在平原上；大寨在北方，全年无霜期只有一百五、六十天，一年只能种两熟，我们在南方，全年无霜期二百二、三十天，一年能种三熟；大寨平均每个劳动力种五亩地，我们才种一点六二亩。可是，大寨贫下中农在那样不利的条件下，实现了“十年造地”规划，在“七梁八沟一面坡”中，把四千七百多块跑水、跑肥、跑土的“三跑田”，改造成了每块四、五十亩的人造平原和高产稳产的“海绵田”，贡献一年更比一年大。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农田基本建设留下的尾巴还是不小，有些河流还是弯弯扭扭，需要拉正开直……毛主席说过：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何况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好，我们凭什么理由可以自满，可以停步不前呢？

再同大寨大队比产量，比贡献，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远远落在大寨大队后头。如果用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来进行比较，以一九七三年为例：大寨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五千一百

三十三斤，我们只有二千三百三十五斤，大寨超过我们一倍以上。如果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三年中卖给国家的商品粮来进行比较，在绝对数上，我们虽然比大寨多，但是按商品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计算，大寨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七，我们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点八。按每亩粮田提供的商品粮计算，大寨四百二十五斤，我们四百二十三斤。按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商品粮计算，大寨六千八百斤，我们只有二千零六十四斤。这些差距难道还算小吗？

再从一些对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公共积累和社员分配收入以及文化教育来看，我们同大寨大队的差距也很显著。到一九七三年为止的大队公积金，大寨达八十余万元，平均每户一万元，每个社员一千八百二十六元，每亩耕田一千零三十八元，我们只有六十三万一千元，平均每户一千五百零三元，每个社员三百五十二元，每亩耕田一千零三十八元。社员分配，大寨大队的全年劳动日值，七年来都是一元五角，而我们在搞得好的时候为一元三角七分，一九七三年则只有一元零六分。大寨大队每个劳动力每年平均收入四百一十元，我们则只有二百六十一元。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大寨大队实行了十年一贯制，普及了中学，我们只普及了小学教育，能上中学的只占小学毕业生的百分之五十。此外，我们群众性的文娱、体育也不如大寨大队开展得普及、经常、活泼、多样。

我们同大寨大队相比，摆出了那么多的差距，那末，造成这些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千差距，万差距，根本的差距是我们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不如大寨贫下中农高，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如大寨贫下中农自觉。“农业生产要大上，先要打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仗。”这就是我们在学大寨中的一条根本经验。最近，我们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进一步看到了我们支部工作抓大事抓得不够紧，学习和批判抓抓放放，时紧时松，首先是我们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包括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联系群众等方面，都还不如大寨。由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经常深入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教育做得不够，因此，在我们少数社员、干部中，一有机会就会有“重工轻农”思想冒出来。现在，我们经过全大队社员和干部的广泛讨论，特别是讨论了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以后，一致表示要进一步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性。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更好地学习大寨贫下中农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修订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〇年的发展农业生产规划，并且立即行动起来，从今年三秋以后开始，奋战六年，进一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争取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实现农田园地化，排灌沟渠系统化，建成桥梁适应机械化，四旁植树搞绿化。为把八二大队建设成为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教育革命 经验总结

编者按：教育战线掀起了学习朝阳农学院先进经验的热潮。学朝农学什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学习他们使“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农业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搞开门办学，目的也正在于此。要进一步搞好开门办学，必须加强领导，反对放任自流。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现在的问题是要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注重实效，继续前进。

中学开门办学的一个新经验

——南市区中学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的调查

何 欣

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学生参加学农劳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生事物。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新生事物，南市区各中学结合学农活动，普遍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短训班，使学生在学农期间，受到了具体生动的思想路线教育，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本领，为深入开展中学教育革命，改变城市中中学生不熟悉农村，不了解农民的状况，创造了一个新的经验。

据不完全统计，在去年“三秋”学农活动中，南市区二十七所中学，先后举办了拖拉机、汽油机、脱粒机、收割机、水泵、农村电工、四大作物栽培、土记者、测量、饲养、会计、赤脚医生、针灸、中草药、兽医等近二十个科目，一千零十四期短训班，参加的师生共有二万六千四百多人次，平均每人参加二至三期。通过短训班，学生把在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带到

实践中运用、验证,把农村三大革命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高到理论上来分析,大大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拖拉机短训班为例,二十七所中学办了二百二十九期拖拉机短训班,有五千八百多人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塘严中学有一个班的女同学,原来认为开拖拉机女同学总归不行,这次通过短训班大胆实践,不仅全班二十多个女同学都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而且有的还学会了开丰收35型大拖拉机,下田顶班战“三秋”,用实际行动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男尊女卑”、“生而知之”的反动谬论。市十中学中四(1)班的学生,通过短训班,全部学会了“四机”(拖拉机、汽油机、收割机、脱粒机)的拆装和使用。许多学生在“三秋”中顶拖拉机手耕田、运输,深受贫下中农欢迎。

从南市区各中学的实践来看,结合学农活动开办短训班之所以能够取得明显的效果,主要是由于坚持了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毛主席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农村是锻炼青年学生的好课堂,广大贫下中农是教育学生的好老师,南市区各中学在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时,都注意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对学生进行具体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有些学生在学农活动中存在重技术轻政治、重工轻农的思想,他们就普遍开展了“学《方向》,批变相,树理想”(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批判林彪的“变相劳改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的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树立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蓬莱中学有个学生,开始只想学开拖拉机,不愿参加土记者短训班,认为学会开拖拉机可以有一技之长,将来“吃香”。还说:“我连作文也写不来,还学什么土记者?”贫下中农却对他说:“正因为你没学好,所以要补上这一课。”还教育他,学习是为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不是为个人,“有了技术就吃香”是修正主义思想的反映。大队土记者也联系本地实际,给他上了“为贫下中农掌好笔杆子”这一课,使这个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在日记中写道:“贫下中农土记者帮助我明确了学习目的性,我要为革命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认真学当土记者,用这枝来之不易的笔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赞扬贫下中农好思想。”参加土记者短训班以后,他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思想和写作水平都有了提高,不仅天天记红色日记,还写出了一篇有质量的调查报告。塘严中学为了联系实际,把饲养员短训班办到了饲养场,但有的学生却怕脏怕累,甚至在劳动时还捂着鼻子。针对这种情况,贫下中农和教师就一方面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方面组织跟班培训,使学生通过劳动实践,树立以农为荣的思想。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许多同学不仅不嫌猪棚臭,而且脏活累活争着干。通过短短几十天的学习,就学会了配料、拌料、挑水、担粪,还会给猪打针喂药,既练了思想,又学了本领,成了称职的新饲养员。由于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许多学校的学生通过短训班学习,从实践中体会到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体会到知识青年到农村锻炼的必要性,纷纷表示毕业后要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到农村干一辈子

革命。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对于小课堂教学是一个很好的延伸和补充，有许多问题小课堂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解决不了的，到农村办短训班就解决了。比如，中学二年级教材中拖拉机这一章，过去在教室里上，同学对拖拉机上的机件都没有感性认识，所以老师讲得吃力，学生听后也印象不深，在短训班上课，学生对机件都看得见、摸得着，听后就容易理解。但是，南市区许多中学教师体会到，到农村办短训班还只是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一个条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必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组织教学。因此，他们在教学活动中，一般先让学生参加有关农业机械的操作实践，获得感性认识，再由贫下中农讲师讲解机械构造和安装使用的基本原理，然后指导学生动手拆装修理，并进一步联系工基课已学过的有关原理，由教师、学生和贫下中农讲师共同归纳总结，提高到理论上来分析验证。这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浅入深，从感性到理性，符合认识规律，教学效果就较好。比如，市十中学在“四机”短训班学习165F型汽油喷雾机时，先安排学生参加两个半天的喷洒农药劳动，然后集中拆机讲解构造原理。在讲解过程中，又联系喷药劳动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引导学生看清汽油机中汽、油、火三者的辩证关系。然后指导学生分组拆装，人人动手动脑，充分消化理解。讲师又设置故障，让学生自己想办法排除，引导他们总结出排除故障的方法和规律。这样，通过学习讲解与劳动实践，全班四十四名同学全部掌握了汽油机的使用和拆装技术，并能排除简单的故障。此后生产队就放手让学生独立进行喷洒农药劳动，他们在反复实践中又进一步掌握了汽油机的性能和操作技术。这种边上课边实践的教学方法，大大活跃了教学气氛，调动了学习积极性。同学们反映说：“黑板上学机器，从原理到原理，纸上谈兵不会用；现场学习汽油机，既懂原理又能开。”贫下中农也说，这样办班好，时间短，收效大，忙前办，忙中用，短训班成了支农战斗班。

第三，坚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从战争学习战争。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时间比较短，学生还要参加劳动，因此短训班的学习内容一定要突出重点，不能贪多求全，面面俱到。所谓重点，南市区中学教师的体会，就是根据目前农村三大革命所急需的内容。这样，每个学生通过一次学农活动，就能学到一、二项实际本领，几年坚持下来，学生就比较能适应三大革命的需要了。比如，文建中学这次办赤脚医生短训班，就以针灸疗法为重点。他们着重学习了人体主要穴位，进针技术和农村常见病的针灸疗法。许多学生大胆地在自己身上试验进针，同学之间也相互扎针，然后跟赤脚医生门诊、出诊，为贫下中农扎针治病。由于突出重点，学生都比较熟练地掌握了简易的针灸疗法，还建立了五十多份病史记录，经过整理提高，已经编为学习班的讲义。为了突出重点，使学生能从实践中学到本领，短训班在时间安排上，南市区各中学一般都采取农忙之前以教学班为单位，集中培训五到

七天,使学生初步掌握某一项本领的基本知识;生产大忙开始后,学生就分到各生产队,结合劳动实践,边学边提高。这样,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重点突出,效果明显。

第四,坚持以贫下中农兼职老师和学校教师、学生的三结合。从南市区中学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师都长期生活在城市里,又是从旧学校出来的,因此既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更缺少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南市区除了组织一批教师提前几天下乡,先办教师的短训班,补上必要的“缺口”而外,主要采取了和贫下中农兼职教师相结合的办法。他们组织专业教师(如拖拉机由工基教师,测量、会计由数学教师,赤脚医生由卫生教师,土记者由语文教师等等)与贫下中农讲师对口,共同备课,共同辅导。还挑选短训班的学生骨干担任辅导工作,他们是第一期的学员,又是第二期的辅导员。实践证明,这样三结合的师资队伍,是办好短训班的重要保证。贫下中农讲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当地情况熟悉,讲课能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很容易被学生接受;中学专职教师可以根据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帮助学生从理论上加以分析和提高,和贫下中农讲师起着取长补短的作用;学生当辅导员,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以发扬学生之间互相帮助的风气,而且学生自己学了再教人,体会深,教得也快。

第五,坚持领导上第一线。任何工作“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次南市区各中学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之所以能取得成效,关键也在于领导能够上第一线组织群众的积极性。许多学校领导体会到,要领导学农,不到农村去,坐在办公室里指挥是不行的。因此,从区教卫组到学校各级领导,都主动和教师学生一起深入农村。这次“三秋”学农由党支部领导成员带队的学校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由正副书记带队的占一半以上。全区还配备了几十名工宣队员、校革会成员参加学农,从组织上加强领导。由于领导上第一线,思想工作也上了第一线,许多好的经验及时得到了总结,短训班中出现的问题也及时得到了解决。有些教师原来担心,学农劳动时间短,农活多,季节性强,要办好短训班有困难,后来看到领导也深入农村,信心就足了。

目前,南市区各中学的领导和教师,正在认真总结这次结合学农活动举办短训班的经验,并打算在这个基础上,考虑整个中学阶段应有一个通盘计划,每个学生至少有两次学农的机会,每次时间在一个半月左右,每期有重点地解决语文、数学、工基、农基等学科的一些主要内容。他们还打算与学农所在地中学互相挂钩,对口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促进城市中学的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大道阔步前进。

扫马路见闻

——在长治路清道班的半个月里

上海师范大学 阎水金

上海公交公司汽车一场 陆晓禾

我们俩，一个是上海师大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一个是公交汽车一场的售票员。最近，我们都参加了有关部门举办的一个哲学学习班，班里提出虹口区长治路清道班哲学学得不错，我们就跑到这里边扫马路边调查学习来啦！

说老实话，开始我们心里还真有点纳闷呢！清洁工人扫马路，一把扫帚，一只畚箕，这里能有什么大学问？但是，俗话说得好：“看人挑担不吃力”。扫马路的头一天，我们俩就出了“洋相”。一把大扫帚在清道班工人师傅手里轻巧得很，可在我们手里偏偏就是不听话。工人师傅已经扫了一大段马路，我们却还在原来的那段路上忙得团团转。马路两边的垃圾，一边多，一边少，我们为了图快，就专拣多的一边先扫。可是，我们前脚刚扫过，后脚就刮来一阵风，吹得满地又都是垃圾，只好重新再扫。一位老师傅见我们累得满头大汗还是扫不快，就走过来微笑着对我们说：“二位同志，你们扫马路还得注意风向，上风头垃圾少，下风头垃圾多，下风头的垃圾都是上风头刮来的。扫马路要先扫上风头，再扫下风头，这就叫垃圾跟风走，人要顺风扫。”短短几句话，顿时使我们心里开了窍。照着她的话去做，果然扫得又干净又省力。

扫马路确实有学问呢！“垃圾跟风走，人要顺风扫”，这句话就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哲学启示。它说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它事物相互联系着的。扫马路由于是“露天操作”，和许多自然条件有着密切关系。“垃圾跟风走”，正是反映了垃圾和风的关系。因此，要扫好马路，首先就要找出垃圾和周围事物的联系，从中引出其固有的客观规律。“人要顺风扫”，就反映了对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如果是盲目地乱扫，结果就只能是吃力不讨好。

要真正掌握扫马路的规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就拿扫马路中经常遇到的旋风来说吧，过去清道班的工人师傅见到这种风最头痛，都

叫它“鬼头风”。有时两三个人，畚箕对畚箕，扫帚挟扫帚，好不容易扫拢了一堆垃圾，可是一阵“鬼头风”，就把垃圾又卷走了，气得工人师傅只好扔扫帚。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他们就注意在实践中观察“鬼头风”的踪迹，留心各种现象。有一次，他们发现许多被“鬼头风”吹得团团转的垃圾，突然在一处停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上前一看，原来是一滩水把垃圾沾住了，这下可解决了问题。再仔细一观察，发现了在房屋高低交错、转弯抹角的地方最容易发生这种“鬼头风”。于是，他们扫到这种地段的时候就先泼上一点水，这样“鬼头风”再“鬼”，也不能把垃圾卷走了。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客观事物尽管是相互联系着的，但光凭老经验办事是掌握不了规律的。只有在实践中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自觉地发现事物间的这种联系，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做好各项工作。

实践出真知。几年来，长治路清道班的工人师傅，正是在向自然环境的调查中，掌握了许多在不同的气候、季节情况下工作的特点。比如，秋冬之交，树叶经过一夜的霜冻，早晨太阳一晒，都变得很脆，加上无轨电车“小辫子”的拍打，到上午九点多钟树叶掉得最多，他们就在这时候注意勤扫多扫。他们还发现，每年十一、十二月份，总有几次树叶大落，而每次大落的前几天，天气总是突然闷热，接着就是刮一场大风，下一场大雨。掌握了这个气候变化的规律，他们就提前做好突击的准备，使路面做到及时扫清。又比如，过去下大雨，把马路冲得又光又亮，有的同志就说，清道工作是“大雨大礼拜”，“小雨小礼拜”。但是雨过天晴，阴沟盖附近以及马路低洼的地方，都积满了泥沙和垃圾，扫帚扫不掉，还得用铲子铲。后来他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来个“大雨大干”，“小雨小干”，一下雨就用扫把勤刷路面、沟底，这样，天一晴马路就干干净净了。

掌握自然规律的特点，这还仅仅是做好清道工作的一个方面。马路上车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垃圾都是车辆行人丢下的。因此，在清道工作中历来有一个“一人扫”和“百人扔”的矛盾。这个矛盾长治路清道班的同志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又请教了清道班的工人师傅。在长治路上扫了十几年马路的朱雪珍师傅对我们说：“过去碰到这个矛盾可伤脑筋啦，往往你刚扫清爽一会儿，果皮杂物又扔了一地。有些行人吃甘蔗，一路吃，一路扔，跟着他们拾还来不及。特别是夏天食品店门口，满地都是棒冰纸，风一吹，到处乱飞，路面简直没有干净的时候。”

“那这个矛盾怎样解决的呢？”我们急切地问。

朱师傅说：“开始我们也是干着急。后来我们就对这个矛盾进行了具体分析，感到这个矛盾并不是不能解决的。‘百人扔’对我们清道工来说是多数，但在整个社会上还是少数，再说这些人扔垃圾往往是不自觉的，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在前面，就可以尽可能地缩小这个范围。根据我们的分析，人为制造的垃圾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商店门口。比如水果店，一年四季瓜果不断，各种瓜皮果壳扔得很多，我们就与商店取得联系，在店门口多放几只废物箱，还同商店一起建立了开门扫、中午扫、关门扫的‘三扫’制度，保持店门口的整洁。另一类就是马路附近的居民造成的，主要是炉灰、菜皮等垃圾。我们就掌握他们出炉灰、拣小菜的时间，做到及时扫清。再就是行人。这一类人虽然比较复杂，但也不是没有规

律。比如，马路冬天有太阳的一边，夏天阴凉的一边，行人多，垃圾也多。电影院、车站等热闹的地方，行人停留多，垃圾也比较多。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就采取‘适时扫’、‘巡回往返扫’等办法。而且，我们还利用废报纸做了许多纸袋，看到行人吃东西，就主动送上去，好让他们集中起来丢进废物箱。这样，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清洁工作就好做多了。”

这时，旁边的一位老师傅插进来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情况：在她清扫的地段中，有一段人行道上总是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垃圾，看来也不是有意扔的，并且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他们抱着寻根究源的态度，顺着垃圾一路追踪下去，发现垃圾在一家门口停住了。敲门进去一问，原来这里住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由于子女都不在家，只得自己一颠一拐地到三十米外的地方去倒垃圾，年纪大了，手发抖拿不稳畚箕，倒垃圾时经常走一路撒一路；碰到下雨天，就干脆把垃圾倒在马路上，影响了环境卫生。这件事说明，某些垃圾的产生是由各种特殊的原因造成的，这就需要用特殊的办法处理。后来他们就主动轮流到这位老太太的家中帮助倒垃圾，终于保持了路面的清洁，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看这件事，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启发。”朱师傅接着说：“这位老太太可以说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矛盾的特殊性中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我们清道班工人到有困难的居民家中帮助倒垃圾，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反过来，这种新型关系也反映在社会各个方面对清道班工人的支持上。如果就事论事地看待‘百人扔’和‘一人扫’的矛盾，这个问题是永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清道工作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毛主席提倡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广大群众中有深厚的影响，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使‘百人’扔垃圾，变成‘人人讲卫生’，不就可以转被动为主动，化清道工作中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吗？毛主席说：‘动员起来，讲究卫生’。这就是说清道工人不仅要扫垃圾，还应当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做到大家不随手丢垃圾，一起来搞好环境卫生；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于是，我们除了自己经常到影院、车站等人多的地方做好宣传工作外，还和学校、街道取得联系，组织退休工人和学生上街宣传爱国卫生。结果矛盾很快发生了转化。过去有些行人吃完水果，就随便把果皮往地上一扔，现在却主动协助我们搞好卫生工作；有些小学生过去在马路边玩打仗游戏，把黄沙石子扔了一地，现在不仅不扔，而且主动操着土喇叭在路边帮我们搞好卫生宣传。这样，扔垃圾的人少了，讲卫生的人多了，‘百人扔’和‘一人扫’的矛盾就较好地得到了解决。”

听到这里，我们的脸不禁红起来了，联想起自己经常在车上售完票后，就随手把票根往窗外一扔，吃完东西时也往往把废物随便乱丢，自己是方便了，清道工人却增添了许多麻烦。亲爱的读者，当你随手往路上扔糖纸、果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清洁工人为了保持我们的城市环境卫生，他们是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啊！

我们的调查越深入，感受也就越来越深。长治路清道班的工人同志为什么能够这样自觉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扫马路的规律？原因正如工人老师傅说的：“要扫清马路上的垃圾，首先要扫除思想上的垃圾，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是啊，同样是一把扫帚，一只畚箕，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清道工作的效果就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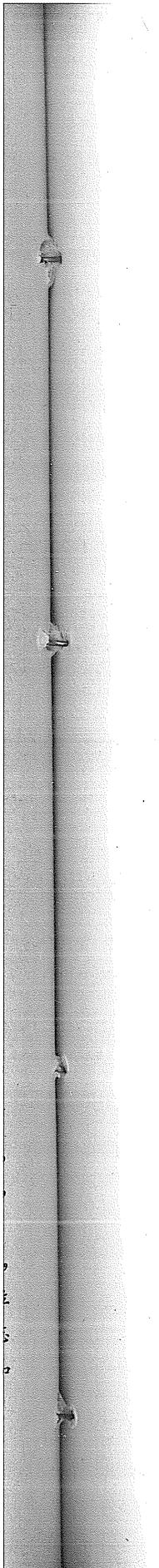
不一样。过去，有些同志由于思想上看不起清道工作，扫路时敷衍了事。附近的饮食店、居民对他们很有意见，批评他们是“只顾自己扫，不顾灰尘飘”。有些青年受了社会上旧习惯势力的影响，扫马路时，帽子拉得低低的，口罩戴得大大的，看见熟人就扔下扫帚躲起来。后来，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才懂得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许多老工人还回忆解放前的清扫工，身穿“红马夹”，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受剥削，只有在新社会，清洁工才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清道工作和其他革命工作一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阶级觉悟提高了，头脑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就牢固了。在班长赵雪云同志的带动下，全班同志忘我劳动，做到了“人不离马路，手不离扫帚”。每天天还没亮，他们就已把马路清扫干净。往往有时晚上十点多钟，当人们已经熟睡时，他们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许多同志几年来连星期天也不休息，经常上义务班。班长赵雪云，有一次由于工伤事故跌断了臂骨，但她放弃了两个多月的工伤假，坚持用一只手握扫把扫马路。这样干不觉得苦和累吗？这个问题可提得既聪明又愚蠢。须知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苦乐观。在资产阶级或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那些人眼中，这样做确实又苦又累。但长治路清道班的老师傅却自有其革命的苦乐观。他们常常笑着说：“为人民服务嘛，这可是最幸福最光荣的事呀！”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长治路清道班的同志做了许多看起来是“份外”的工作。清运工人来不及运走垃圾，他们去帮助推车；阴沟阻塞住了，工务所忙不过来，他们就帮着疏通阴沟。有时，他们还主动地帮助工厂整理马路仓库，把废纸、纱头、金属块等一点一点拾起来，集中售给国家。几年来，他们回收了废钢铁三十八吨，杂铜一千多斤，废纸、纱头近十吨，价值一千二百多元。他们还主动和水果店、陶器店挂钩联系，上门清理收集甘蔗皮、稻草头，运回站里烧窑砖，节省柴草三万多斤。这些“份外”事，看起来多么细小平凡，但只要能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长治路清道班的同志都笑呵呵地乐意去干。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他们结合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开展回忆对比活动，进一步激发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决心精益求精地做好各项工作，为搞好城市环境卫生更多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短短的半个月调查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长治路清道班。只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哲学，怎样去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

编者附记：哲学在哪里？它并不产生于书斋之中，而是来自千百万群众的斗争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哲学正在进一步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工农兵群众手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锐利武器。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但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里，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垃圾，需要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去扫除。我们将欣喜地看到：广大的工农兵理论小组的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下，积极地运用哲学的武器，奋身投进当前这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伟大战斗中去！



一九七五年

第三期

总第十九期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代号: 4-192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 0.25元